

裴多菲

革命的一生

引 子

裴多菲·山陀尔(1823—1849年)是匈牙利十九世纪的伟大的爱国诗人,是匈牙利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革命的杰出的战士和歌手。他以诗歌为武器,为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同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作战,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他的诗歌作品不仅在匈牙利,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弱小民族和国家里,得到广泛的流传。裴多菲诗歌传播的领域,直到今天还在不断扩大,他的诗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出版。在中国,提到裴多菲就会联想到鲁迅,因为他是我国最早评介裴多菲的人。鲁迅在一九〇七年所著《摩罗诗力说》第九节中,就以敬仰的心情,推崇他“所著诗歌,妙绝人世”,称赞他“为国而死”的革命精神。伟大的人民作家茅盾是我国翻译裴多菲诗的第一个人。远在一九二一年他就以雕冰的笔名翻译了裴多菲的最著名的政治抒情诗《匈牙利国歌》(即《民族之歌》),发表于同年十月十日上海出版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栏中。这是裴多菲诗的第一首汉译文。由沈泽民翻译的抒情诗《惟一的念头》即《一个念头在烦恼着我……》,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四号。三年后,即一九二五年一月的《语丝》周刊上发表了鲁迅翻译的裴多菲的五首诗,流传很广,影响较大。后来,革命诗人白莽翻译了他的评传和九首诗,其中《自由与爱情》一诗,受到我国广大读者的欢迎。由于鲁迅与茅盾带头介绍,裴多菲早已成为我国读者所熟悉的外国诗人之一。

诗人的家世与少年时代

裴多菲·山陀尔于一八二三年一月一日出生在多瑙河与蒂萨河之间阿伏德大平原上的吉什——

克洛什村。他原来的姓名叫彼得罗维奇·山陀尔，从一八四二年开始，以裴多菲·山陀尔笔名发表诗歌作品。父亲彼得罗维奇·伊斯特万（1791—1849年）出身于斯拉夫民族，自幼贫苦，做屠夫为生；母亲赫鲁兹·马丽亚（1791—1849年）出身于马扎尔民族的一个农奴家庭，在出嫁前做过洗衣妇和女仆。父亲性情倔强，对孩子的教育非常严厉；母亲是一个身材不高的黑发女人，一个温顺的农妇，她娴静、温柔、忧郁，特别喜欢孤独。

根据十九世纪初期匈牙利的社会特点，裴多菲的家庭属于下层劳苦人民。彼得罗维奇·伊斯特万按社会法律规定的条例来说，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最底层的农奴。正如裴多菲于一八四八年所著《老旗手》中回忆他父亲时写道：“连他死后的一小块坟地，也说不上属于他自己；”裴多菲童年时的家境，几乎处于赤贫状态。奥地利皇室对匈牙利进行新的勒索或者加重赋税，本国的封建统治者也就极力将苛捐杂税强加于农奴身上。

一八二四年十一月裴多菲两岁时，他的家便迁居到菲尔艾吉哈兹。这是一座不大的只居住匈牙利人的半农业小城。在这里，诗人的父亲开设肉铺。他当屠夫，杀猪宰羊，赢得较多利润，日子很快就富裕起来。裴多菲一直把这座小城当作他的故乡，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提到，因为他在吉什——克洛什村只居住两年就移居到这座小城来，在这里度过自己的童年，留下他幼年时期的美好记忆。

一八二八年裴多菲五岁，父亲把他送进菲尔艾吉哈兹小城的学校，但不久又转学到克奇克梅特城读书。他在这里，除了学习匈牙利语以外，还学习拉丁语。彼得罗维奇对自己的儿子抱有更大的希望，希望把他培养成一个牧师或者商人。这对于一个只有七岁的幼儿来说，远离家乡和父母的照料，食宿于学校，该是何等困难啊！

一八三一年彼得罗维奇全家迁到萨波德萨拉什，父亲把他接回家，在本村的小学只读了一年书。一八三一年裴多菲又被父亲送到萨尔山特列林兹小城的学校，专门攻读拉丁语。裴多菲远离家乡和双亲，他心情沉重，养成了一种喜爱孤独、性情孤僻、不爱交际的性格，只是苦读书、专心写诗作文。童年时期，裴多菲相当聪明，学习成绩优异，特别是他有掌握语言才能。除了匈牙利语以外，他还能用斯洛伐克语自由交谈。

一八三三年裴多菲十岁时，彼得罗维奇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把儿子送进布达佩斯最好的学校学习拉丁语和德语。在布达佩斯学习期间，裴多菲厌烦校方的拉丁语和神学课；但是他对匈牙利古典作家，例如巴拉塞·巴林特、兹里尼·米克洛什、秋柯诺依·维德兹·米哈依、包恰尼·雅诺什等，特别是魏勒斯马尔蒂·米哈依的作品使裴多菲沉醉与迷恋。他日夜攻读文艺作品，其中包括拜伦、雪莱以及海涅和贝朗瑞的诗歌。此外他对戏剧产生强烈的兴趣。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布达佩斯民族剧院看戏，成了剧院的常客。这一时期，裴多菲的学习成绩突然下降了。这使裴多菲的父亲很恼火，他认为自己的儿子进入大城市，受到了上流社会恶习的影响，便决心让儿子离开繁华都市。裴多菲在布达佩斯只学习了一年，又被父亲送到多瑙河岸边的奥赛德的学校学习。他在奥赛德学习了三年，由于阅读许多欧洲进步书籍和匈牙利古

典文艺作品，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他的这一段艰苦生活，在《旅行书简》中有较详细的记述：

一八四三年冬末至一八四四年春初，正是寒气袭人的季节，我在这城里度过了极其艰苦的岁月。我挨饿，受冻，落得孤身一人，病倒在一位穷苦、善良的老太太家里。感谢上帝！我没有死去。如果不是她对我的怜悯，分担我的痛苦，我一定会死亡。亲爱的朋友，如今这封信，我只好从另一个世界上给你发山了。那时候，我是一个被抛到人世之外的年轻的流浪演员，上帝和人毫不理睬我，对我冷若冰霜。三年半以前，我在剧院里扮演过配角，引不起任何人对我的注意。后来我走下舞台，来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间，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只有在这个时候，我的耳边才响起了阵阵的、热情的、雷鸣般的呼声：“裴多菲·山陀尔万岁！”

裴多菲望成为一个演员，渴望通过舞台的艺术生活向人民群众宣传先进思想。裴多菲想当演员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一八四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在佩斯民族剧院上演莎士比亚的名剧《李尔王》时，他扮演剧中一个傻子的角色。关于这次演出，裴多菲写下了《我第一次扮演的角色》的八行小诗：

我成了演员。第一次
我登台表演，
在舞台上我第一次
露出我的笑脸。

我表演得非常得意，
微笑从我的心底涌出；
啊，我不知什么缘故，
表演时我失声恸哭。

裴多菲参加了流浪剧团。通过步行、乘驿车和雪橇，他几乎游遍了半个匈牙利的江山。他夜宿在酒店、小客栈、军营、露天帐篷和多瑙河桥头下面。这使他有接触下层劳动群众，了解他们的悲惨生活和命运。在流浪剧团里，裴多菲开始搜集民歌。他采用劳动人民的口语运用民歌形式开始创作诗歌。在十九世纪初的匈牙利诗坛上，当时流行着拉丁语诗的风潮，格律繁严、语言晦涩，与劳动人民隔绝。裴多菲希望通过搜集民歌，突破拉丁语诗的限制，采用民族语言，在诗歌创作上探索出一条健康的道路。他认为民歌是劳动人民的创作，有着真切的感情，但是民歌必须加以提炼，提高到真正的艺术珍品。裴多菲尝试的结果，证明他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在这种创作思想指导下，他陆续写下五十多首民歌体诗篇。从发展上来看，民歌赋予了裴多菲以新的生命，哺育着诗人成长。就是到他后期，在战场上完成的战歌，同样保留着他前期采用民歌体进行创作的优点。

助理编辑时期

鲁迅于一九一七年在《摩罗诗力说》中评论裴多菲时说：“浪游变易，殆无宁时”，这是对诗人少年时代性格的全面概括。一八四三年冬底，裴多菲衣裳褴褛，带着一卷诗稿，踏上了通向布达佩斯的大路。他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这卷诗稿上面。他想卖掉它，换取几片面包。在寒冬季节，独自远行，离开德布勒森城，奔往首都。举目不见一个人影儿，雨点打在他的脸上，同眼泪汇合，冻成冰凌。经过一个星期，裴多菲终于到达布达佩斯。他决心拜访当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魏勒斯马尔蒂。他把诗稿交给了魏勒斯马尔蒂，意想不到的的是他的诗受到魏勒斯马尔蒂的赞赏，并介绍给当时的民族丛书社，他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了。

一八四四年一月，裴多菲开始担任《佩斯时装报》的助理编辑。他的流浪性格稍有改变，漂泊生活逐渐趋于稳定。他开始组织佩斯的激进青年，努力从事政治与文学研究。裴多菲所领导的以毕尔瓦兹咖啡馆为活动中心的青年，后来形成为“三月青年”的组织。他们在佩斯起义中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裴多菲不仅是这个组织的领导者，而且是这一批青年人的精神领袖。

这一时期，裴多菲作为瓦豪特·依姆雷的助手，共同从事《佩斯时装报》的编辑工作。这个刊物并非纯文学杂志，为了迎合妇女们的需要，经常刊登时髦服装样式，宣传巴黎妇女所追求的服装改革。它是一个带有封建性质、崇拜欧洲文化、轻视民族文学传统的守旧派刊物。裴多菲做了这个刊物的助理编辑，只是由于生活所迫，为了有固定的薪金收入。更主要的，是裴多菲有了一个安静的写诗的环境。裴多菲精力充沛，意志坚强，对未来抱有必胜的信念。他期望以《佩斯时装报》和科苏特创办的《佩斯新闻》为阵地，向本国的封建复古派和德国的反动浪漫派作家们进行斗争。在他担任一年的助理编辑时期，受到封建复古派作家和自由妥协派作家们的疯狂攻击。除此之外，裴多菲开始写下了一系列的政治抒情诗，例如《爱国者之歌》、《贵族》、《给在国外的匈牙利人》、《为什么我不出生在一千年以前？》、《奴隶国的儿子》等。这些抒情诗标志着裴多菲革命诗歌的开始。他在《爱国者之歌》一诗的开头，就表达了他热爱祖国的感情：

我是你的，我的祖国，都是你的，
我的这颗心，我的灵魂；
假如我不爱你，我的祖国，
我能爱哪一个人？

裴多菲把自己比喻成教堂，把祖国比喻成祖坛，在他的心灵中虔诚地供奉。在这首诗中，诗人发誓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永远不变。一八四四年一月，裴多菲在德布勒森的一所草棚里写他的第一首政治讽刺诗《贵族》，开始向贵族地主阶级进行挑战；

把那恶棍吊上鞭刑柱吧，
用棍棒来清算他的罪恶；
他偷，他抢……鬼知道，
他干的坏事实太多。

匈牙利启蒙运动时期的进步作家也曾经创作过揭露贵族地主阶级的贪婪、落后、愚昧等方面的讽刺作品，但是他们的目的在于教诲他们如何改正或者克服，以求得进步。裴多菲和他们完全不同了。他号召奴隶们起来同贵族地主阶级进行血战。

这一阶段，裴多菲除写作政治诗以外，也是他采用民歌体写作和搜集歌谣最丰收的时期。例如他的《谷子成熟了》、《我走进厨房》、《谁能让花不吐蕊》、《傍晚》以及被鲁迅引入《七论“文人相轻”——两伤》的杂文中的《我的爱情并不是……》等民歌体诗篇，被音乐家谱曲传唱，深受匈牙利人民的喜爱。裴多菲用极流畅的语言、和谐的音调，把大自然的美、草原上的牧羊人、多瑙河与蒂萨河畔的渔夫、田野里劳动的男女青年、巴空尼大森林里的山盗，都描绘在他初期采用民歌体创作的诗歌里了。他把自己的诗稿在农村小酒馆、大车店里朗诵，听取劳动人民的意见和接受他们的审查。他前期的许多诗篇，都经过这种考验之后才最后定稿的。他把下层劳苦大众的反应作为衡量自己诗歌的重要标准，努力使每一首诗从内容直到形式都为群众所喜爱。虽然裴多菲在早期的尝试中也有时失败，但是他认定民族诗歌发展的方向，毫不灰心地向前探索。为了创立民族诗歌，为了实现“诗歌革命”的理想，裴多菲不顾反动作家们的叫嚣，充满信心地宣布：“……将来诗歌本身也许把我带进最完善、最真正的匈牙利诗歌的形式中去。”（1847年《诗歌全集序》）

一八四四年冬季，裴多菲爱上了一位十五岁的少女乔包·爱德尔卡。他们一见钟情，互相爱慕。诗人写下初恋阶段的爱情诗，献给这位少女：

姑娘，你可见过多瑙河？
它从一个岛的中央流过；
我说你那娇美的面容，
轻轻荡漾着我的心波。

绿色的落叶从岛旁，
被卷入蓝色的水浪，
我说你那希望的浓荫，
悄悄撒在我的心上。
——《给爱德尔卡》

可是他们相识不久，乔包·爱德尔卡突然患病，于一八四五年一月七日死去，被埋葬在盖莱伯斯陵园里。这给诗人精神上很大的打击。乔包·马丽亚在她的《回忆片断》中这样记载她妹妹乔包·爱德尔卡死后的情形：“……圣诞节刚刚过去两周，爱德尔卡死去了。两位诗人——我的丈夫和裴多菲将她埋葬。裴多菲在灵柩前痛哭失声。安葬了爱德尔卡以后，裴多菲在我们家里住了十四天，他住在停放过爱德尔卡尸体的房间，也就是睡在爱德尔卡生前所睡的床上。”在这位清秀的少女逝世后的两个月里，裴多菲经常来到盖莱伯斯陵园，并且写了许多悼念爱德尔卡的诗篇。同年三月二十日，出版了诗集《爱德尔卡坟上的柏叶》。诗集共收三十四首短诗。这部诗集从内容来看，诗人深切表露对初恋少女爱德尔卡的天真的怀恋。裴多菲同他前辈诗人

的坟头诗有所不同，在裴多菲的诗中有控诉时代的激进的成分。在《爱德尔卡坟上的柏叶》组诗中，裴多菲热切地表露了对这位少女的纯洁的爱情的向往、追求与怀念，并以浓厚的感伤主义的情趣，哭诉少女过早夭亡；同时诗人赋予了理想中的爱情以一种美好的浪漫主义的色彩。例如《唉，葬仪的钟响了！》、《古老的大地……》、《枝头的花瓣纷纷地飘落》以及被我国革命诗人白莽译成汉文的《雪呵，你是大地的寿衣》等诗，都属于这一类作品。

一八四五年四月一日裴多菲开始了他的长途旅行。他乘驿车从布达佩斯启程，向喀尔巴阡山脚下进发。他几乎游历了半个匈牙利，于同年六月二十四日返回布达佩斯，历时将近三个月。他这次旅行的重要收获，是完成了《旅行札记》散文作品。旅途中，裴多菲受到劳苦人民的热情款待。经过北部山区艾伯利耶什、吉什——马尔克山城时，青年男女排着队伍，奏着音乐，举着火炬，向他表示欢迎。由于裴多菲的诗获得读者的高度评价，人们都以结识这位新诗人为荣。当他旅行到利姆——松包特和戈摩尔州的时候，时逢大选，他被选举为上诉法官。他在诗友盖雷尼和顿姆巴的家里住了一个月的光景，他们讨论了关于民族诗歌的发展方向问题，并进行赛诗，还有参观古迹等活动。他参观了匈牙利北部的菲莱克、萨莫什克、萨尔沟城堡的遗址，听到许多山民关于古代反抗土耳其人的战斗传说。这一切增添了裴多菲在旅途中的兴致。他在《旅行札记》中写道：“除了人民，哪些诗人能有这样丰富的想象呢？”一八四六年，他写下长篇叙事诗《萨尔沟城堡》，这是此次访问三座城堡遗址的重要收获。

《旅行札记》不仅是裴多菲按照旅行路程记载途中见闻，而且他借题发挥，抨击了资产阶级议会选举中，地主资产阶级政客们钻营禄位、搞投机、拉选票等卑劣手段；同时他对当时文艺界浪漫派作家的矫揉造作与虚弱无力，对封建复古派作家的墨守成规和陈词滥调，都作了有力的批判。本篇游记尚能帮助读者了解诗人青年时代的苦难生活和对祖国壮丽河山的描绘，反映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写作本篇游记时，裴多菲年仅二十二岁，他那时的思想尚未成熟，未经受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战斗洗礼，缺少饱满的生活和战斗经历。游记的某些段落或对个别事件和景物的描写，并无深刻的含义，有些地方显得油滑，甚至流露出自然主义的色彩。本篇的薄弱之处，反映出作为杰出的诗人裴多菲早期创作中的缺点。

裴多菲完成北部高地一带的旅行回到布达佩斯以后，他应剧作家艾格莱希·戈包尔（1808—1866年）的邀请，完成了剧本《卓尔特·马尔奇》的创作。由于这个剧本不适于舞台演出，民族剧院委员会没有通过这个剧本。裴多菲在一气之下，将手稿烧毁。匈牙利的进步作家和评论家们，总为诗人的这一“愤怒”和“激动”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损失而感到惋惜。

裴多菲少年时期的流浪生活，给他带来无穷的困苦；但是这也使他有可能会从各方面接触穷苦大众。一方面他看到京城的辉煌、富丽和奢华，贵族地主的豪横野蛮，投机商人的牟取重利；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流浪在多瑙河岸边的乞丐、穷人的黑面包和孤儿寡妇的泪痕，劳动人民的汗水和疲惫的人影。他在《佩斯》一诗中写道：

修鞋匠的粗暴的打骂行为，
车轮下结束了穷人的生命，
小偷、山盗，还有投机商贩，

佩斯街头成了乞丐的大海。

看哪！在天气晴朗的初秋，
穿得花花绿绿的小姐们出外郊游，
面颊涂着浓厚的胭脂，臀部凸起，
老爷们牵着狗儿游戏……

诗人在指出上层社会的腐败之后，他的笔锋又转向京城生活的另一个侧面：

光荣的纨绔子弟们在街头游荡！
我称佩斯是买卖牲口的市场。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里，裴多菲把布达佩斯看成是两个阶级的生活矛盾表现最为鲜明、最为尖锐的城市。一切矛盾都集中在这个古老的都市里。裴多菲以劳动人民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古老的京城，再加上他本人就受着剥削的重压和穷困生活的煎熬。他把自己和那些享福作乐的贵族地主们对立起来，沿着平民诗人的道路前进，以平民歌手的姿态出现，无情地揭露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愚昧无知、不求进取的贵族老爷们。这一时期，裴多菲诗歌创作中的鲜明的民主倾向和反抗旧世界的激进因素增多了。裴多菲越来越感到作家责任的重大，严格要求自己，坚定地前进，同旧势力展开斗争。他一再强调：“谁是诗人，谁就得前进，千辛万苦和人民在一起！”（《致十九世纪的诗人》）同时他又善于团结他周围的作家，引导他们为劳苦大众进行创作。例如被鲁迅引入《诗歌之敌》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中的裴多菲的诗《题 B·B₂·夫人照相诗》（即《题在瓦·山夫人的纪念册上》），并将这首诗译成了散文：“听说你使你的丈夫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吧，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这首诗是裴多菲题给瓦豪特·山陀尔夫人乔包·玛丽亚的。裴多菲批评了这位女诗人在婚后的生活中沉醉于个人的所谓幸福当中。鲁迅一再引用这首小诗，就是因为当时中国现实社会中的一部分作家沉沦于个人主义的狭隘圈子里。

一八四五年夏天，在爱德尔卡逝世半年以后，裴多菲又爱上了一个地主女儿麦德尼阿斯基·伯尔娜。她有着惊人的美丽面容。只因为她的美，使裴多菲在爱德尔卡的爱情悲剧之后，摆脱了精神上的苦恼，使爱情的女神在诗人的心灵中苏醒。这位骄傲的庄园少女对裴多菲这样一个全国闻名的诗人是羡慕的。她爱裴多菲的诗，但并不喜欢裴多菲这样一个瘦弱多病的穷苦人。裴多菲自己十分清楚，他与这位“乡下美女”没有任何共同的语言。但是，裴多菲被她的美所迷恋，写了许多爱情诗献给她。一八四五年秋天，出版了《爱情的珍珠》，共收入爱情诗四十首。这些作品，有一些是诗人的失败之作；在今天看来，它们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社会价值。为了单纯追求女方，流露出自然主义的感伤情调，甚至有些诗纯属无病呻吟。但是在这四十首诗当中，也有些精品，例如《我愿是树，假如……》、《我的爱情在一百个形象中》、《假如上帝……》以及《我梦见战争来临》等等。

第二次出游，《云》组诗的创作

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六年春季，裴多菲的思想正处于“淡淡的哀愁”的时期。这一阶段，他完成了激动人心的《云》组诗，共写了六十六首。这些短歌具有欧洲革命风暴来临前的时代的特征。裴多菲受到欧洲大陆上滚动着的革命浪潮的冲击，对于摧毁匈牙利封建制度的信心越来越坚定，勇气越来越足，似乎一种不可遏止的愤怒即将爆发了。

这一时期，正处于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的前夜。在匈牙利，异族侵略和国内的阶级压迫日益尖锐化。诗人在思想上的苦闷、彷徨、探索，向往法国革命而无法实现，对民族的前途感到一片朦胧和晦暗。裴多菲的思想几乎濒于“绝望”的边缘。他的这种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云》组诗中，而且在创作《云》组诗的后期，他写下《希望》的小诗。一九二五年，这首小诗被鲁迅引用在他的散文诗《野草》第七篇《希望》中，说明当时鲁迅的思想与裴多菲的思想相近似，并且受到裴多菲的良好的影响：

希望是什么？……它是卖弄风情的娼妓。
不管谁，她都同样地拥抱，
当你失去了最美丽的珍宝，青春，
那时候，她就把你抛掉，抛掉！
——《希望》

《云》组诗充分表现了裴多菲的悲观、矛盾、愤慨和痛苦追求的心情。那时诗人向往法国革命而在匈牙利无法实现，农民骚动屡遭失败，民族衰落，前途暗淡，再加上他对爱德尔卡的爱情又遭受打击，使他的思想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的浮云。他在写作《云》组诗的后期，即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七日他从萨特马尔写给诗友盖雷尼·符利捷什的信中，写下这样富有深刻哲理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鲁迅于一九二五年作《希望》篇时，曾有两处引用了裴多菲的这句话，意思是说，绝望的不真实、不存在，正如希望的不真实、不存在是一样的。按照匈牙利文直译，可译成，“不管是希望还是绝望，都是骗人的。”

一八四五年或者稍后一段时期，尽管裴多菲的思想发展濒于“绝望”的边缘，但是他仍然没有停止同封建势力的斗争。感伤的诗他写过，锋芒毕露的政治诗更是他创作的主流。他写下《匈牙利的贵人》讽刺诗，同时也写下了《祖国颂》赞美先人丰功伟绩的颂诗。他指出“哪里有自由，哪里才有祖国！”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

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裴多菲在同旧制度斗争中感到势单力薄，对胜利感到渺茫，这说明诗人前期富于浪漫主义的幻想。当他接触到匈牙利的现实社会之后，必然会产生一种失望与感伤。这是一般革命者必然要经过的一个阶段。

一八四七年裴多菲在攻读欧洲哲学，特别是在他掌握了黑格尔左派的辩证法之后，开始运用辩证的观点分析“绝望”与“希望”的关系。裴多菲并不否定“绝望”，也正如他不能全盘肯定“希望”一样，在“绝望”中闪烁着希望的火花，在“希望”中同样潜伏着绝望的恶运。这是裴多菲思想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从一八四六年春夏之交开始，裴多菲的诗歌创作确定

以政治诗为主的新方向，号召奴隶奋起砸断铁锁链；

我梦见流血的日子，
它将世界全部毁灭，
在旧世界的废墟上，
建设起崭新的世界。

《我梦见流血的日子》

一八四六年春季，裴多菲结束了他的短暂的

“淡淡的哀愁”，并以实际行动向革命迈进。他在布达佩斯组织起“十人协会”和匈牙利第一个作家团体“青年匈牙利”，并且出版了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的刊物《生活景象》。“十人协会”和作家协会的建立，增强了裴多菲从事革命活动的力量。他的“孤独”与“绝望”情绪逐渐减轻了。

一八四七年七月，裴多菲从布达佩斯启程，开始他第二次长途旅行。同年十一月十一日返回布达佩斯，历时六个多月。这次旅行他完成了第二部重要散文作品《旅行书简》。全篇由二十封信组成。诗人此次出游的原因有四：第一，应他的朋友盖雷尼·符利捷什的邀请，讨论关于民族诗歌的发展方向问题；第二，时处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夜，他借机出游，以了解下层革命的力量；第三，他同森德莱·尤丽亚定于九月八日在托尔顿结婚，那种急切的心情，促使他早日启程；第四，他的战友阿兰尼·雅诺什邀请他到索伦塔作客，并讨论关于创作人民诗歌的问题。裴多菲此次旅行的路线，有些是他在一八四五年出游时所经过的地方。他以书简体写下《旅行书简》的游记，每到一处歇脚，便发出一封。除了记载途中见闻之外，他借题发挥，抨击匈牙利文坛上的反动作家，并对欧洲著名大作家横发议论。例如他对歌德、狄更斯、大仲马等，曾经说了一些精辟的言论。他一再声明他不喜欢歌德，不喜欢《浮士德》和《少年维特之烦恼》；他称赞狄更斯小说揭露社会的深刻性，称许大仲马描写人物的真实。他的这些言论，虽然出于自己的爱好，却有他独特的见解。

裴多菲与阿兰尼的友谊

一八四七年二月间，裴多菲接到阿兰尼·雅诺什（1817—1882年）的长诗《多尔第》的手稿，读后大为赞赏。裴多菲认为这首长诗是匈牙利文坛上的最大的成就之一。裴多菲读完《多尔第》手稿，立即给阿兰尼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附《致阿兰尼·雅诺什》一诗。这首诗和附上的信件，不仅是裴多菲和阿兰尼的友谊的开始，更重要的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匈牙利文坛上讨论关于创作人民诗歌的良好开端。从他们通信讨论人民诗歌开始，到裴多菲于一八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瑟什堡一带反沙皇战役中阵亡为止，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来往书信共六十二封。信中谈到关于创作人民诗歌的问题，商讨共同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以及关于裴多菲在战争年代出征、结婚、生子等等，说明两大诗人的友谊的深厚。

《多尔第》的创作成功，不仅给阿兰尼带来了声望，而更重要的是给他带来了裴多菲的友谊。裴多菲最早发现阿兰尼是一位伟大的人民诗人。他们的政治信仰相同，有着一致的文学创作原则，两大诗人互相起着有益的影响。他们那种积极向上、拯救祖国于危难的心情十分相近。他们来往的书信，除了讨论文艺问题之外，特别是在爱国战争爆发后，裴多菲奔赴战场的赠诗和通信，那种相依为命的关系，更可见两大诗人之间的友谊深厚。

裴多菲对于创作人民诗歌的论述，是他给阿兰尼书信中的精华。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裴多菲的那种锐利的眼光。一八四七年二月四日裴多菲在写给阿兰尼的信中，阐明了他的诗歌理论：

……不管人们怎样讲，可是真正的诗歌是人民的诗歌。我们都赞成这样的意见：应该使它成为统治力量。一旦人民在诗歌领域中成为统治者，那就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成为统治者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而这正是本世纪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是每一个具有崇高心灵的人的目标，这样的人再也不能袖手旁观，眼看几千个人过舒服的日子和享福作乐，而千百万人民却在受苦受难。让人民上天堂，让贵族下地狱！

一八四七年二月间最初的几封通信中，裴多菲提出了关于创作人民诗歌的理论；从创作方法、诗歌内容，直到诗的形式，都得到了阿兰尼的赞同。裴多菲主张在作品中歌颂劳动人民，绝不要歌颂国王，即使起过进步作用的国王也不要歌颂。他说，“要晓得，无论是黑狗还是白狗，总而言之，一句话——都是狗。”

裴多菲主张在作品中要歌颂农民起义领袖，发扬罗马奴隶主长期统治下的斯巴达克思的反抗精神。所以在裴多菲后期的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反抗旧世界的英雄人物的形象，这同他的创作理论是分不开的。他的指导思想，就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写，激励人民同哈布斯堡王朝进行斗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裴多菲陆续写下了《为了人民》（1847年）、《拉科治》（1848年）、《刑扬》（1848年）以及长诗《使徒》（1848年），他高度颂扬主人公锡尔维斯特的反抗精神。

从一八四七年起，裴多菲的民主主义思想更加成熟，在诗歌创作上更趋于定型。关于“诗的美”的问题，裴多菲也有他精辟的见解。他于一八四七

年三月三十一日给阿兰尼的信中说：“我是一个为了‘真’连‘美’也可以牺牲的人。……只要是‘真实’的，也就一定是‘自然’的，是好的，而且我也认为必然是‘美’的！这就是我的美学观……”裴多菲不仅把他的美学观点在实践中加以运用，而且从理论上证明文学的人民性的重要。他在一八四七年二月四日给阿兰尼的信中说：“不管人们怎样讲，可是真正的诗歌是人民的诗歌。”他又继续阐述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指出：“一旦人民在诗歌领域中成为统治者，那就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成为统治者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可见裴多菲的先进思想。

裴多菲和阿兰尼开始只是通信，很长时间未能见到面。一八四七年六月七日，裴多菲来到阿兰尼的故乡索伦塔，两大诗人初次会晤。他们的相会，成为匈牙利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裴多菲在给盖雷尼·符利捷什的信中说：“……你知道为什么我急忙来到索伦塔，而又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呢？因为在索伦塔住着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是我的朋友，《多尔第》的作者阿兰尼·雅诺什。如果你读过了这首诗，我也就连一句话也不必说了。这首诗是一位很平常的乡村公证人写的。他住的房屋长不过五步，宽不过两步。这房屋是他的全部家产。我的朋友，缪斯女神并非保守的女人，她们在一百年以前，飞出了天国，翅膀连接着翅膀来到人间，并且高呼‘人民万岁！’。缪斯女神从壮丽的赫利孔高山上下下来，飞进简陋的茅舍，并在那里定居。我是多么幸福，因为我就是诞生在草棚里啊！”

裴多菲离开索伦塔回到布达佩斯以后，曾经多次写信给阿兰尼，邀请他来作客。特别是在裴多菲结婚以后，那种邀请的心情更加真切。一八四七年九月九日裴多菲给阿兰尼写信说：“我在惊惶失措地准备迎接你来佩斯——来我家作客。直到今天我仍然是一个穷光蛋，然而你来了，我们三个人（指裴多菲、阿兰尼、裴多菲夫人——笔者）在一起就更加困难了。……我们三个人挤在一起，三个人睡在一张床上，三个人吃两盘子食品。如果饭菜不够了，我就说我不饿……那就让你们俩吃个饱。”裴多菲的这些话虽然带有嬉戏的成分，却也说明他们之间的友谊多么深厚。裴多菲的开朗的性格、坚强的政治信念，以及对未来人生的渴望，在他给阿兰尼的信中反映得特别完整。特别是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爱国战争爆发后，裴多菲将他妻子森德莱·尤丽亚和儿子卓尔坦安顿在阿兰尼的家里，从此裴多菲就走上永别的战场。这是何等激动人心啊！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裴多菲战死，直到晚年阿兰尼的心情还不能平静，一直缅怀裴多菲的友谊。

与森德莱·尤丽亚结识

一八四六年秋天，裴多菲在艾尔多特的一个舞会上结识了森德莱·尤丽亚。裴多菲向她求婚，尤丽亚允许了，但是遭到她父亲的拒绝。尤丽亚的父亲森德莱·依格诺茨是一个死守陈规旧例的庄园主，他极力反对女儿嫁给像裴多菲这样一个流浪诗人。他无法理解年轻一代的思想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更无法理解他女儿在婚姻问题上的先进思想。若是同裴多菲绪成亲戚，怎能门当户对呢！裴多菲同他的岳父始终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后来在他许多的作品中，留下了他岳父的残暴、愚昧、落后等地主阶级的形象。

裴多菲与尤丽亚一见钟情，互相爱慕。裴多菲写了许多爱情诗献给她。诗中充满着追求、赞美、怀疑与渴望，例如《给尤丽亚》、《我是一个热恋的人》、《我见到东方最艳丽的花枝》以及采用民歌体写成的《小树颤抖着……》，等等，都是裴多菲与尤丽亚初识时留下的优秀的爱情诗篇。

一八四七年九月八日裴多菲与尤丽亚在艾尔多特村举行结婚仪式。从一人四六年九月裴多菲与尤丽亚结识，到一八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裴多菲战死时为止，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诗人写给他妻子的爱情诗总共一百零二首。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是健康的，充满着强烈的政治内容与青年人渴望新时代诞生的气息。例如他的最著名的爱情诗《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就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革命箴言诗。

裴多菲与尤丽亚结婚后，取道科尔多、索伦塔，直奔布达佩斯。他们在首都定居后，裴多菲的生活颇为安定，诗歌创作量达到了最高潮。这一年里，他写了一百五十七首抒情诗，三首长篇叙事诗：《萨尔沟城堡》、《法官》、《傻瓜伊斯托克》以及由二十封书信组成的《旅行书简》和两个短篇小说。

裴多菲曾经说过：“爱情是我写诗的源泉。”他同尤丽亚结婚后，他觉得他自己无比幸福。他不仅有一个美丽而善良的妻子，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志趣和意愿相同，有着共同的理想与生活目的。正如他在《致尤丽亚》（1847年）一诗中写道：“我不仅爱她外形的苗条，更爱她心灵的美丽。”尤丽亚背叛了她的庄园主家庭，同穷苦诗人结了婚。她勤奋好学，用心思索，追随裴多菲进行诗歌与散文的创作。特别是在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佩斯起义的日子里，她成了裴多菲的得力助手。从《自由与爱情》（1847年）开始，裴多菲献给他妻子的每一首爱情诗，都在引导她向革命迈进，使她跨越原来阶级的局限，努力理解全人类解放的重大意义。裴多菲献给尤丽亚的充满强烈政治内容的爱情诗，对她的思想转化起过巨大的作用。在佩斯起义的日子里，裴多菲以有这样一个革命伴侣而感到骄傲。她走在裴多菲的思想和行动计划的前面，“像一面军旗在队伍前面迎风招展。”这就使裴多菲在革命年代毫无顾虑地投身于革命战争，例如，在《旗帜》、《告别》、《我的妻子和我的宝剑》等爱情诗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虽然在裴多菲与尤丽亚度蜜月期间，他们的内心充满着无限的幸福与欢乐，但是在诗人的心灵中却也积聚着忧郁和沉闷。例如在他的最著名的抒情诗《九月的最后一天》中，就充满着无限的忧伤。他预料他自己必将死在战场上，而且预示在他死后，他的妻子很快地会忘掉他。裴多菲的预料完全正确。他在战场上阵亡差十天不到一年，森德莱·尤丽亚脱掉黑纱，嫁给布达佩斯大学一位名叫霍尔瓦特·阿尔帕德教授。

三月十五日佩斯起义

三月十五日在匈牙利首都佩斯，爆发了有学生参加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市民起义。领导这次起义的就是爱国诗人和民主主义革命家裴多菲。

这次革命的目的是废除封建制度和把匈牙利从奥地利统治下解放出来。三月十五日清晨，一万多名革命群众冒雨集合在民族博物馆前，裴多菲当众朗诵了他在三月十三日即维也纳起义的当天晚上写成的战斗诗篇《民族之歌》。裴多菲领导的起义队伍，以匈牙利三色旗为前导，向全国最大的兰德纳印刷所前进，以人民的名义夺取了印刷机器。他们冲破书报检查，印出了裴多菲的《民族之歌》和由约卡伊·莫尔起草的、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十二条》。起义队伍冲向布达监狱，释放了因创办《工人报》而被囚禁的政治犯谭启奇·米哈依。

裴多菲在《民族之歌》中，提出了那个时代最尖锐的问题：“做奴隶，还是做自由人？”他这样激昂地高呼：

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
是时候了，现在干，还不算太晚！
愿意做自由人，还是做奴隶！
你们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

奥地利皇室的统治与国内封建帝制的压榨，迫使农民多次起义，以反抗外国侵略和地主阶级的压迫。一五一四年在多热·久尔吉领导下的，首先在特兰西瓦尼亚，后又遍及匈牙利全国的农民起义，震撼欧洲各国，它为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三月十五日，起义的游行队伍一直延续到深夜。整个布达佩斯沸腾起来了。条条街道，装上了彩灯和彩旗，到处悬挂着裴多菲的画像。

起义的当天晚上，在佩斯的民族剧院上演了考托诺·尤若夫的反抗德国统治的著名悲剧《邦克总督》。裴多菲的《民族之歌》已被谱上曲，全场响起一阵悲壮的歌声，使出席者纷纷泪下。歌声刚一停止，群众要求刚从狱中被释放的谭启奇·米哈依登台演说。裴多菲在三月十五日《日记抄》中写道：“匈牙利的自由啊，在你诞生的这一天，我向你致敬！我曾经为你祈祷过和斗争过，现在我第一个表示欢迎你。我的快乐是那样无边……”裴多菲认为，一个民族没有独立与自由，牛马般地生活下去，那是耻辱。一八四八年在匈牙利历史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已达到白热化程度。裴多菲和匈牙利劳动人民一样，目睹祖国长期遭受土耳其和奥地利等帝国的侵略和奴役，而他们自己却受尽折磨，为什么不能致力于自己的解放事业呢？裴多菲认为，夺取政权，以掌握民族命运的时机已经到来，重整旗鼓，高举农民起义领袖多热·久尔吉和拉科治·费伦茨的大旗，向革命迈进的时机已经到来；手持军刀，走向宝座，砍断国王头颅的时机已经到来。所以裴多菲在三月二十一日写给阿兰尼的信中说：“我认为，革命是一种暴力改造！”他在三月十七日《日记抄》中又写道：“凡是我们要的，应该用武力取得。”裴多菲在革命必须走武装道路这一点上，他同自由妥协派作家们完全不同。

裴多菲领导的三月十五日佩斯起义，影响着整个匈牙利的各个阶层。革命浪潮冲击着偏僻落后的村庄和农舍。三月十八日宣布废除农奴制，西北地区的农民自动起来平分了庄园主的土地。在贝克什州和乔纳第州，起义群众占领了伯爵老爷们的牧场，并且冲进文书管理所，烧毁了全部地契和公文，

并把土地平分给贫苦农民。裴多菲高度赞扬农民起义的英勇行为。他把人民起义的浪潮比喻成洪水，歌颂洪水的力量，让洪水奔腾、咆哮，冲毁腐朽的封建制度。

裴多菲看得十分清楚，三月十五日佩斯起义只是准备阶段。他把这次起义称作“思想革命”，残酷的流血斗争还在后面。决战临近时，他的诗歌的音调变得一首比一首更加猛烈和热情，洋溢着对祖国火一般的热情和对革命前途的无比关怀。他把诗歌作为武器，直接投入战斗，实现了他曾经宣布过的“每一首歌，就是一个战斗的青年”（《穿破衣服的士兵》）的愿望。裴多菲坚定不移地同敌人进行斗争。三月二十日，他同小说家约卡伊·莫尔创办了《生活景象》杂志，三月十九日他同革命民主主义者巴尔菲创办了宣传激进的革命思想的杂志《三月十五日》，四月二日，谭启奇·米哈依的《工人报》也复刊了。裴多菲的诗歌与政论文章，不断地在这三个刊物上发表。

一八四八年五月裴多菲出席了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国家代表大会。他在会议上热情地发表演说，抨击巴江尼反动政府的投降主义政策。他无情地揭露那些“说得多，做得少”的自由主义空谈家们的反动本质。他坚定地接受了落在他身上的一切考验，坚持革命必须走武装斗争道路的政治信念。在佩斯起义取得最初胜利的时候，一些自由主义的妥协分子建议派出一个由二百名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去维也纳，企图上书奥地利皇室，要求奥皇回到宪法的轨道上来。但是裴多菲坚决反对这种投降主义的作法。他认为统治者的凶残，用祈求的办法是改变不了的，民族矛盾必须以武装斗争来解决。

裴多菲领导的三月十五日佩斯起义，影响逐渐扩大。在布达佩斯街头，到处耸立起一排排的街垒，起义群众持枪进行巷战。在裴多菲的推动下，革命的浪潮席卷匈牙利全国。这一时期，他写下了最著名的革命诗篇《大海沸腾了》，高度赞扬起义群众的革命行动：

大海沸腾了，
人民的大海；
那可怕的威力，
掀起滔天骇浪，
震动着天和地。

本篇写于佩斯起义后不久，大约在三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之间。这正是裴多菲领导的佩斯起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潮时期。他在《大海沸腾了》一诗中，表现了他对革命前途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对起义人民力量的信任。诗人不仅把匈牙利人民起义比喻成“沸腾的大海”，而且也包括了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家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在起义的日子里，裴多菲的心境是那样欢快和激昂：

你们见过这舞蹈？
你们听过这音乐？
假如你们没见过，
现在就应该懂得：
人民是多么欢乐！

正如革命导师列宁所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在起义的日子里，匈牙利劳动人民创造了被那些自由主义者们的狭隘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裴多菲不仅有革命热忱，而且有冷静的头脑和实际的战斗经历。他以唯物主义和辩证的观点，分析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斗争的发展前途。他指出一条人民起义的真理：“船在水上航行，水在船下翻腾，可是水永远是主人翁。”在匈牙利北部地区，特别是别克什州的农民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受到全国和邻国的进步阶层的大力赞扬。他们放火烧掉大贵族地主的庄园和粮仓，占领并平分了土地。仅在一八四八年四月至五月的两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就发生了二十四次农民暴动。

裴多菲在三月十七日《日记抄》中，总结三月十五日佩斯起义的经验时写道：“这就是三月十五日。它的功绩将永远被写入匈牙利历史的篇章。假如事情仅限于此，那么这也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但是作为一个开端，它是良好的，英勇的。一个婴儿在开始迈开最初几步路的时候，比一个成年人走上多少里的路程，要更加困难得多啊！”在起义的日子里，裴多菲预测到革命发展的曲折道路。由于欧洲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有夭折的可能。但是他始终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将革命推向前进。他认为，奴隶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整个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一条血河”。裴多菲对这点认识得十分清楚。

在民族解放战争中

裴多菲发动的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佩斯起义，到了同年秋天，便发展成为由科苏特领导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爆发后，裴多菲一手拿笔，一手紧握军刀，参加了消灭俄奥侵略军的大血战。

一八四八年九月十一日，克罗地亚总督耶拉契奇奉奥皇命令，率军进攻匈牙利，妄图以武力消灭由裴多菲领导的三月十五日佩斯起义的成果。九月底，匈牙利民族的叛徒朗伯格伯爵来到布达佩斯，宣布解散匈牙利国民议会。与此同时，奥皇任命他为匈牙利军队的最高统帅和全权代理总督。鉴于敌军以强大的武力进攻，科苏特动员全民武装，从此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开始了。

九月二十八日，佩斯全城到处传播朗伯格即将到来的消息，起义群众有的捣毁军火库，取出武器，武装自己，有的用棍棒、铁叉武装起来。当天下午二时，朗伯格的四轮快马车通过多瑙河上的链锁桥头时，起义群众高呼“绞死叛徒！”、

“祖国在危急中！”、“共和国万岁！”等口号，并把朗伯格从车子上拖下来，当场用匕首割下了他的头颅。裴多菲为了赞扬革命人民的英雄主义精神，写下他最著名的诗篇《把国王吊上绞架！》：

杀死了朗伯格，吊死了拉图尔，
别的暴君也会得到同样的下场！
人民啊，这才显出了你们的力量，
你们干得太好了，干得实在漂亮！
可是，你们还要干他最后一——
把国王吊上绞架！

十月六日，维也纳的起义群众把奥地利陆军大臣拉图尔捉住，在陆军部门前的路灯杆子上把他吊死。革命人民的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使裴多菲等革命家受到鼓舞与教育。维也纳人民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自由是不可分割的”革命口号的推动下，极力支援裴多菲发动的三月十五日起义与科苏特领导的爱国战争。裴多菲认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就是至高无上的国王，所以他把斗争的锋芒始终指向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

你们想把树上的枝桠一气折下，
可是春天一到，又抽出了新芽；
你们要连根拔，你们要连根拔——
把国王吊上绞架！

裴多菲号召起义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要连根拔”、“要干他最后一——把国王吊上绞架！”

接着裴多菲又写下《愤怒的箭头射出去！》。它的战斗性和艺术性完全可以同《把国王吊上绞架！》相媲美：

愤怒的箭头射出去！
把我面前的宝座射穿；

我一箭射在天鹅绒上，
它痛得发抖，喷吐灰烟。
万岁，共和国！
万岁，共和国！

像这样很短的抒情诗，在革命战争中发挥过很大的作用。诗人将全部的仇恨凝结在箭头上，向辉煌的宝座射去。裴多菲的这一箭，曾经代表了亿万人民共同的愿望、意志和信心。

面临奥皇的反革命武装干涉，匈牙利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英勇抗击侵略军的进犯。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积极响应科苏特和国防委员会的号召，踊跃参加民族自卫军。但是，在民族解放战争进行到紧要关头的时候，以莫里兹·佩尔采尔将军为首的一部分匈牙利军官，代表大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主张同奥皇妥协，对耶拉契奇军队的进攻毫不抵抗。裴多菲以极大的义愤写下《给民族》一诗，积极主张同叛徒的卖国行为做斗争：

最大的敌人隐藏在我们中间，
正是那些卑劣的卖国的兄弟，
一个人就破坏我们千百万人，
好像一杯酒掺入了一滴毒液。

裴多菲号召起义人民对叛徒绝不要手软，要“判他们死刑！”、“处死他们！”他认为，对叛徒要采取坚决镇压的手段。正在这个时候，科苏特率军支援维也纳革命，由于一些军官的叛变，致使援军停在莱达河附近，无法前进。科苏特还把叛军中的一些人押回佩斯枪毙了。裴多菲在这一时期同科苏特的军事观点完全一致。

裴多菲在战场上写的诗，突出地反映了战士们的那种前仆后继、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和革命品质。他最著名的《作战》一诗，描绘匈牙利军队取得胜利的情景，诗人以卓越的艺术手法，将激烈的战斗场面集中压缩在战士们进军的画面上：

愤怒布满大地，
愤怒封锁着高天！
鲜红的血流淌着，
像是红色的阳光！
看！西沉的太阳，
闪烁着紫色的光线，
前进，战士们，
前进，匈牙利人！

在爱国战争中，裴多菲的战斗生活和他的诗歌创作体现了高度的统一。从一八四八年起，鲁迅称他的诗“渐倾向于政事，盖知革命将兴”，直到他在战场上献出生命。裴多菲说：“我是杀人的工具——兵，同时我也是一个诗人。”（《我又听到云雀在歌唱》）他正是这样严格地履行革命战士和诗人的神圣职责，一手拿笔，一手高举军刀，奔跑在战场上。

裴多菲与贝姆将军

贝姆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青年时期当过炮兵，参加过一八三一年的波兰起义。起义失败后，贝姆流亡国外。葡萄牙革命时期，他曾经战斗在里斯本。一八四八年三月，他来到维也纳指挥战斗，后转战匈牙利，被任命为特兰西瓦尼亚一带军事总指挥。恩格斯曾对贝姆作过很高的评价：“如果说当时还有人能挽救维也纳的话，那么贝姆便是惟一的一个。”

一八四九年一月十五日，裴多菲离别妻儿，从匈牙利第二大城市德布勒森出发，去特兰西瓦尼亚，参加贝姆军队。临行前，他把他的妻子和儿子安顿在阿兰尼·雅诺什的家里。裴多菲的到来，受到贝姆将军的热情欢迎。这样一位著名诗人和三月十五日佩斯起义的青年领袖来到战场，贝姆高兴极了，任命他为自己的少校副官，消息顿时传遍全国。裴多菲来到贝姆将军身边，同贝姆一起战斗，他的心情是愉快的。他在四月十一日给《公报》编辑部的信中说：“……对于任命我为少校，我却感到冷漠；对于我当贝姆的副官，我是非常高兴的！”

在同俄奥联军英勇奋战的日子里，裴多菲的战功卓著，他受到贝姆将军的奖励。贝姆亲自把勋章挂在裴多菲的胸前。当时贝姆的右手受了伤，包扎着。贝姆对裴多菲说：“我用我的左手替你挂勋章，因为它距离我的心是那样的近啊！”裴多菲在授奖大会上流着热泪，倾吐他对贝姆将军的深情厚意，“……我的将军啊，对我来说，您比我的父亲还要亲，父亲只给了我生命，而您却给了我荣誉。”贝姆将军已年逾五旬，须鬓斑白。在年龄上他比裴多菲大了一倍，贝姆把裴多菲作为自己的儿子来看待。

一八四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裴多菲同贝姆将军在拜莱兹克相会。这正是鲁迅所说的诗人“三去其地”的最后一次了。在战地上，贝姆将军从快马车上—眼看见了裴多菲，便大声喊起来。贝姆流着眼泪，用法语连声喊着：“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裴多菲与贝姆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的关系亲如父子。

裴多菲在战场上写下一系列歌颂贝姆将军的诗篇，例如《爱尔德利的军队》、《炮声响了四天》、《瓦依达——胡尼亚第城堡》等，热情歌颂贝姆将军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正是这位波兰籍出身的将军，为被压迫被侵略的弱小民族的独立与自由而不息地战斗着，赢得全体匈牙利人民的崇敬。一百年以来，他的青铜像高耸在布达山的向阳坡上，作为国际主义的象征，被匈牙利人民的后代铭记不忘。

“死在哥萨克兵的矛尖上”

匈牙利革命的伟大胜利，使国际反动派极为震惊。经过一年的军事较量，匈牙利革命军取得节节胜利，直抵维也纳瓮城。在哈布斯堡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候，奥皇费伦茨·尤若夫无耻地乞援于俄国沙皇。一八四九年五月八日，尼古拉一世发表了武装干涉匈牙利的宣言。五月二十七日，在沙皇走狗巴斯凯维奇将军统率下，兵分两路向匈牙利进攻。一路为十万人，向加西里亚进犯；一路为三万八千人，进攻摩尔达维亚和瓦拉赫。沙皇的兵力总计约有十四万人，而且多数是哥萨克兵，残暴野蛮，装备优良，并拥有五百七十六尊野炮。尼古拉一世要求奥皇保证俄军给养，奥军的行动必须适应俄军的战略指挥。就这样，俄奥联军对匈牙利发起了新的联合进攻。匈牙利革命军在科苏特和贝姆将军指挥下，运用正规军与游击队并重的作战方法，截住了俄军从北部进攻的路线。在匈牙利腹地，由于科苏特的正确指挥，给奥皇侵略军以致命的打击。奥军入境时约有二十万军队，而在败退出境时只剩下五万人；其余十五万人，有的被击毙，有的被俘虏，有的投降到匈牙利军队方面来了。

由于叛徒的出卖和匈牙利军队内部的分裂，致使革命迅速转向低潮。但是裴多菲却始终充满信心，认为胜利必将属于被侵略者。七月二十二日，裴多菲从马洛什——瓦萨尔赫基写信给他的妻子尤丽亚，鼓励她要对民族解放战争的前景和个人的家庭幸福充满信心，“要忍耐！要冷静！再冷静！”七月二十九日即诗人牺牲前两天，诗人写信向妻子叙述了匈牙利军队“一口气消灭了拥有四千名俄国士兵的一个营”的战果。他给尤丽亚的信，谈得那样愉快和乐观，并打算接她到特兰西瓦尼亚，参观著名的托尔多风景区。

七月三十日即裴多菲牺牲的前一天晚上，他在给尤丽亚的信中说：“……战斗非常激烈，我准备为祖国牺牲！只有这样才是我最光荣的前途……我的妻子啊！咱们的儿子卓尔坦会走路了吗？断奶了吗？要教他说话，逗他笑！”裴多菲在牺牲前说出了多么激昂而又怀恋的话语啊！

由于强大的敌军的进攻，匈牙利军队惨败，粮尽弹绝，几乎全部被沙皇军队歼灭。暂留在贝姆将军手中的瑟克什堡，又被敌军层层包围起来。七月三十一日凌晨，当战斗打响时，贝姆命令裴多菲留在后备部队里；但是诗人违背将军的命令，在冲锋队开赴前沿阵地后，他乘着一辆马车出发了。在菲尔艾基哈兹战地上，一队仅有三百名的匈牙利骑兵打退了两队俄国侵略军。裴多菲少校独自一人站在一条小溪的桥头旁。一位军医连忙劝告他隐蔽。裴多菲毫不畏惧地回答说：“不要怕，什么事也没有的！”这时裴多菲已被俄军发现，并向他开枪；他一闪身，未遭毒弹。这时裴多菲赤手空拳地隐蔽到玉米田里。忽然有两名哥萨克骑兵向他追来，先到的一个向他劈下军刀，他闪身躲过；后到的一个向他投下长矛，刺穿了诗人的胸膛，他应声倒地。这位高呼着民族独立与解放的诗人，就这样“死在哥萨克兵的矛尖上”了。他的尸体同其他匈牙利爱国志士们一起，被埋葬在一千零十个英灵的大坟墓里。

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失败后，关于裴多菲的下落，出现许多不同的传说。有人说，裴多菲不曾战死，仍然活着。有人说，他被沙皇军队俘虏，在西伯利亚的矿井里劳动，同被俘的二千七百七十五名匈牙利国防军一起，在冰天雪地里过着苦难的生活，并渴望刑满后，返回祖国继续参加解放事业。一位被释放的匈牙利俘虏返回祖国后，发表文章和演说，证明裴多菲被沙皇军俘

虏。

也有人说，裴多菲仍留在匈牙利，落得极度贫困，成了乞丐，流浪在多瑙河两岸。还有人说，在乡下的小酒馆里，曾经见过他，不过已成了疯人。

另一种确切的证明，就是在瑟克什堡战地上警告裴多菲隐蔽的那位军医。他看见裴多菲遇难的全部过程。但是这位军医的证明，在当时是很少有人相信的。这里面掺杂着人们对诗人的崇高的怀念、希望和幻想！直到十九世纪末期，关于裴多菲仍活着的传说不再出现。如果那时他活着，已有七十多岁，已是古稀之年了。

关于爱情诗

裴多菲从一八四二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到一八四九年七月战死为止，仅有七年的创作时间。他一生写下八百多首抒情诗和八首长篇叙事诗，以及小说、政论、戏剧、游记等。他的这些作品不仅质量较高，数量也十分惊人。

就裴多菲的八百多首抒情诗来说，其中爱情诗的比例是相当大的，几乎占有半数。他的爱情诗，除了他早期搜集的民歌，例如《谷子成熟了》、《谁能让花不吐蕊》等作品接触到爱情的主题之外，其他爱情诗都是写给三位少女的：第一，一八四五年春初献给爱德尔卡的《柏叶》组诗，共有三十四首；第二，一八四五年秋天，献给麦德尼阿斯基·伯尔娜的《爱情的珍珠》，共收入爱情诗四十首；第三，从一八四六年九月起，到一八四九年七月为止，裴多菲写给他妻子森德莱·尤丽亚的爱情诗，约有一百二十多首。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只谈一谈他写给他妻子的爱情诗，因为这些作品是他爱情诗中的精华，它们体现了诗人忠于祖国、忠于爱情的崇高的道德观念。

提起裴多菲的爱情诗，我们会联想起革命诗人白莽翻译、被鲁迅引入《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的《自由与爱情》：

生命诚宝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这首小诗是诗人同尤丽亚结识四个月以后，即一八四七年一月一日写成的。它是诗人走向革命的进军号角，集中表达了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志士们的共同心声。本篇的基本内容是：自由第一，爱情第二，生命第三。由于裴多菲思想飞跃地发展，使他能够正确地处理自由、爱情、生命这三种关系，从而减轻了他的爱情至上论的观点。

裴多菲于一八四七年在《旅行书简》中，这样描写他和妻子相会的情景：就在这里，就在旅店对面的花园里，我

初次见到了我亲爱的尤丽亚。时间是去年九月八日下午六时至七时之间。从那时起，我的生命诞生了。……自从我和尤丽亚结识以后，在那巨大的缥缈中，她建造了一切，建造了我心中的爱情。如今我回忆起我们相逢时的情景，一幕幕的往事在我眼前浮现。我向四周的树木祝福，我就这样走出了香气四溢的花园。

就在裴多菲与尤丽亚初识的当天晚上，裴多菲写下《给尤丽亚》的第一首诗，倾心赞美这位十八岁的少女：

绯红的脸，绯红的唇，
棕色鬃发，棕色眼睛，
在她的脸上和眼睛里，
上帝啊，蕴涵多少灵魂！
……你说你已爱上我。

你说你爱我，倾心爱慕，
这话已是我生命中的
惟一的一位新救世主。

诗人要征服这位热情的姑娘，征服她的心灵；同时诗人表露了他自己的爱情恰似一条无尽头的水流，卷去他旧日的忧伤。在诗人结束他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一位美丽的姑娘爱上了他，他是何等兴奋、何等愉快啊！

一八四六年九月十九日，裴多菲在艾尔多特村，写下了他献给尤丽亚的第二首诗《我们在外面的花园里》，诗中记叙他与尤丽亚进一步相爱的过程，表露他对这位少女的爱慕与赞美。也许这位十八岁的尤丽亚感到羞怯，却很少以语言来表达她对诗人的爱，于是裴多菲在本篇的最后一节这样劝导她：

你说：“你不要打扰我！”
为什么你这样说？
你是不是已经感到
生命的无比厌恶？
假如你是这样的话，
你怎么能够获得幸福？
假如我们生活在一起，
怎能将永久的时光欢度？

裴多菲与尤丽亚的爱情受到女方父亲森德莱·依格诺茨的阻拦。这给裴多菲增添了疑虑。九月底，裴多菲跟尤丽亚告别，离开了艾尔多特。这是裴多菲与尤丽亚的爱情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诗人表露出求爱心切，交织着怀疑、等待和忧虑的感情；有时也表露出幸福的欢乐。他们初识阶段留下的比较著名的诗篇有《给尤丽亚》、《我是一个怀有爱情的人》、《你爱的是春天》、《题在森·尤小姐的纪念册上》等等。我们可以看出，诗人最初献给尤丽亚的爱情诗，往往倾吐个人的悲哀与欢乐、赞美与追求，社会面十分狭窄，政治内容比较薄弱。

裴多菲离开艾尔多特，返回佩斯，又从佩斯启程去德布勒森。这时裴多菲忽然听到森德莱·尤丽亚被她父亲强行嫁给萨特马尔州的一个名叫乌洛依·安德烈的大地主。这个消息对裴多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裴多菲经过反复询问，证明是谣言。但是在谣言尚未被披露之前，诗人产生怀疑和忧虑，那是必然的。这时他采用民歌体写成了《小树颤抖着……》：

小树颤抖着，
鸟儿向树林飞去。
我的心颤抖着，
当我想起了你，
我想起了你，
娇小的姑娘，
你是世界上，
最大的钻石！

我们读到像裴多菲的《小树颤抖着……》这样一类采用民歌体写成的爱情诗，使我们感到活泼，轻快，韵律的和谐，节奏的自然。诗中的比喻是那样的形象和真切。从这首诗的内容来看，也许没有更多积极的教育作用，但是在诗的技巧和形式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特别是诗人采用大众化口语写诗，为匈牙利人民所喜爱，已被谱曲传唱至今，并被译成六十多种语言。

多瑙河涨水了，
也许就要奔腾。
我的心膨胀了，
抑制不住的爱情。

在裴多菲写给尤丽亚的许多爱情诗中，集中表达对女方的强烈赞美的同时，他把自己的爱情又同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融为一体，诗中渗透着强烈的政治内容。这就是一八四六年十一月六日在沃尔瓦什写成的《我梦见流血的日子》。诗中表达了裴多菲的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梦见战争来临，它将旧世界毁灭，在废墟上建设起崭新的世界。那时他将跃上战马，奔向战场，为民族解放事业而战斗。这首爱情诗的最后三节：

当我的胸膛被刺伤，
会有人来替我包扎，
会有人用吻的香膏，
治愈我深红色的伤痕。

假如我成了个俘虏，
会有人来到我的狱中，
她那启明星般的眼睛，
使监狱放出了光明。

假如我死了，我死了，
死在刑场或者战地；
会有人用她的眼泪，
洗去我尸体上的血迹！

鲁迅当年很重视《我梦见流血的日子》这首爱情诗，远在一九一七年所著《摩罗诗力说》第九节中，就曾引用过这首诗的第二节：“吾今得闻角声召战，吾魂几欲骤前，不及待令矣！”这说明裴多菲的爱情诗中渗透着自发的爱国主义思想，使他自觉地投身于革命洪流，经受炮火的考验。裴多菲不为恶势力所驱使，不为强暴所压倒，他为民族的独立而斗争。就是在此以前，即一八四五年八月间出版的《爱情的珍珠》中，同样表达了诗人愿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牺牲他自己的爱情的誓言：

这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
姑娘，这天属于你和我；
我能为祖国献出生命，

我愿舍去新婚第一夜。
——《我梦见战争来临》

假如那时我从马背上跌下，
一个吻合上了我的双唇；
你的吻！你美丽的自由，
你天上的、光辉的精灵！
——《假如上帝……》

从一八四七年一月一日《自由与爱情》开始，到同年九月八日裴多菲同尤丽亚结婚为止，这九个月的时间里，诗人献给他未婚妻的爱情诗的数量是相当多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为什么我还想念她？》、《爱情》、《花》、《假如我想起我亲爱的人儿》、《除了我以外……》、

《你是我的，我是你的》、《世界多么美丽！》、《我愿是一条急流》、《在绿色山峦的那一边》、《一下子给我二十个吻吧！》以及一八四七年八月中旬裴多菲在艾尔多特同森德莱·尤丽亚交换订婚指环时写下的《八月十五日》等诗篇。这些作品均写在裴多菲与尤丽亚结婚的前夕。那种对人生美好的向往，对民族解放事业必胜的信念，在革命事业中他们彼此相依为命、不怕挫折、奔腾向上的思想感情，使他们在初恋中认清了生活中未来的幸福。物质与金钱并不是爱情的基础，而是要有共同的理想与意志，哪怕任何一方遭到打击或挫折，另一方却永不变心。这是人类进入到文明世界以后的共同的道德观念。在他的《我愿是一条急流》里写道：

我愿是一条急流，
是山间的小河，
穿过崎岖的道路，
从山岩中间滚过……
只要我的爱人
是一条小鱼，
在我的浪花中间，
愉快地游来游去。

像这样采用民歌体写成的爱情诗，读起来多么轻松、自由，又多么舒曼啊！比喻新颖，朴素而且自然。鲁迅在《〈勇敢的约翰〉校后记》中评价裴多菲的诗歌时写道：“他的擅长之处，自然是在抒情的诗……”，就是裴多菲的诗始终保持他的特点：小河流一般的流畅与清澈，富有民歌特色而又不流于俗气的诗风。从内容上来看，《我愿是一条急流》的主题是健康的，诗人想到人生道路的曲折与民族解放事业的艰难。他发出誓愿愿作一座荒林，同暴风雨作战，只要他的爱人是一只小鸟，停在枝头啼叫，这就给诗人以莫大的安慰。即使他成了废墟，被毁掉了，只要他的爱人是长春藤，沿着废墟的墙壁攀缘，这就使诗人得到春天生物复苏的力量。诗人的自比一层深入一层，经受着考验：

我愿是一所草棚，

隐藏在幽谷当中；
饱受风雨的打击，
屋顶留下了伤痕……
只要我的爱人
是熊熊的烈火，
在我的炉膛里，
愉快地缓慢闪烁。

这里我们应该提到他的《为什么我还想念她？》，这是一首优美的爱情诗。一八四七年春初，艾尔多特地区的文书萨什·卡洛依写信给裴多菲，邀请他参加三月二日举行的州政府会议。尤丽亚准备借此机会来此地同裴多菲会面。裴多菲因故没有出席会议，尤丽亚失望地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三月二号！那时我想，就在这一天，裴多菲将向我祝福，我会获得快乐！但是一切都失望了。”裴多菲于三月十二日写信给萨什·卡洛依，并请他把信转给尤丽亚一阅。由于父亲的严禁，尤丽亚未能作复，因此裴多菲写下了这首情调十分低沉的诗：

为什么我还想念她？
为什么我陷入苦恼……
听不到她的任何消息，
我越想越不是味道。

诗人在忧虑中产生了怀疑，这是很自然的。十九世纪的女性要彻底摆脱封建制的束缚，确实要有勇气，何况尤丽亚的父亲是一个顽固不化、死守封建道德的庄园主。怀疑、忧虑，给诗人带来极大的痛苦：

难道她很快地忘记，
很快地忘记了我？
或者，有这种可能，
她从来就不曾爱我。

在怀疑中尚且存在希望。一旦浓雾散去，喜悦就来临了——

我是船夫。风暴来了，
它把一切抛进大海中，
她拯救了坐在空旷的
船舱里的船夫的生命。

《为什么我还想念她？》和《我的爱情是什么？》一样，集中表达了裴多菲在爱情问题上遇到挫折或困难时的苦闷、忧虑、消沉的情调。他把自己的爱情比作急流中的轻舟，他的灵魂是船夫，在不停地同巨浪搏斗；把爱情比喻成鲁莽的孩子，只顾追扑花蝴蝶，却跌进深沟里；把爱情比喻作“希望的寿衣”，“用无光的黑线织成”，把他覆盖起来；把爱情比喻成囚车，载着他奔向断头台。但是在爱情上的忠贞与不断的追求，胜利必将属于进步的

年轻一代。他们确定在九月八日结婚，留下了裴多菲的欢乐的诗句：

一下子给我二十个吻吧，
而且要最甜的！
不，最后还得补充一个，
我的爱人！

这是裴多菲写给尤丽亚的爱情诗的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一八四七年九月八日即裴多菲同尤丽亚结婚到一八四九年七月诗人战死时为止。这是裴多菲的爱情诗产量最多，政治内容较强的时期。

裴多菲在《旅行书简》（1847年）中这样论述他们的结婚仪式：

我们的结婚仪式带有中世纪浪漫主义色彩：大清早晨，在艾尔多特的小教堂里举行的。她爱我，我爱她；我们互相敬爱。我们严肃而发光的脸儿，总想挨到一起，但是终究未能如愿以偿。我们互相望着，微笑着，流着眼泪。……

裴多菲同尤丽亚在首都定居后，裴多菲的诗歌创作量达到了最高潮；当然其中包括许多写给他妻子尤丽亚的有政治内容的爱情诗。我们应该提到他的最著名的爱情诗《九月的最后一天》（1847年），不管从内容或者艺术技巧来看，无疑是诗人最优秀的抒情诗之一：

窗前的白杨树正是一片青翠，
深谷里的花朵仍然开得耀眼，
看哪！那边已是冬天的世界，
大雪已经覆盖着那里的山岩。
我年轻的心燃烧着夏天的烈火，
我的心里仍然是绚丽的春天；
可是我的头发已渐渐花白了，
冬季的严霜已在我的两鬓出现。

裴多菲对秋天大自然的描绘同他自己感情的袒露交融一起，形成了自然界与心灵世界的鲜明对照。秋天来了，冬季已走在人生的道路上。诗人怀着十分忧郁的情感，抒发人生易老、时光易逝的无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正如他在本篇第二节的首句中写道：

花朵在凋落，生命也在奔驰……

裴多菲在蜜月期间写下情调忧郁、沉闷的诗，预示在他的祖国土地上必将爆发战争，为祖国捐躯；而且预示在他死后，他的妻子会很快地忘记他。于是诗人这样质问他的妻子：

会不会有另一个青年的爱情控制你？
你将会把我的姓完全抛弃？

裴多菲的预料完全正确，他逝世差十天一周年，尤丽亚就脱掉黑纱改嫁了。按照十九世纪匈牙利的风俗习惯，丈夫死后妻子要穿黑纱服丧一年。裴多菲的战友阿兰尼·雅诺什在尤丽亚改嫁时，呼天痛哭。他一方面怀念阵亡的战友，另一方面对尤丽亚表示怜悯，感到十分惋惜。阿兰尼认为她不应改嫁，应坚贞守节一生。

裴多菲和尤丽亚在爱情问题上都是十分严肃的。裴多菲捐躯战场，尤丽亚另嫁他人，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同时也是民族的悲剧。裴多菲对尤丽亚爱得那样忠贞和专一，即使他战死，成为共和国坟墓中的一个幽灵，他仍然爱她：

有一天，当你脱下寡妇的黑纱，
挂在我的墓碑上，做一面丧旗，
午夜，为了它，我从坟墓中出来，
我就摘下，把它带到我的坟墓里去。

这四行诗写得多么沉痛，多么忠贞啊！又是多么恐怖与阴冷！他们结婚以后，裴多菲的心灵中的忧郁与欢乐互相交织，形成了他的世界观极为复杂的阶段。爱情，甜蜜的爱情终止了诗人的浪漫生活，给他的生命增添了复苏的力量；然而民族解放的前途黯淡，奴隶们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裴多菲已经预示到欧洲革命洪流不可阻挡。一旦在匈牙利国土上爆发人民战争，他愿跃马当先，驰奔战场，为祖国的独立与自由而战。我们且看他在蜜月期间写的另一首著名的诗篇《凄凉的秋风在树林中低语》：

我的一只手放在她的胸旁，
感到她胸部在轻微地跳荡；
我的另一只手拿着祈祷书：
一本描写自由斗争的历史！

这里指的“自由斗争的历史”，就是描写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的历史书籍。革命前夜，裴多菲也正像当时的左翼激进派的青年们一样，攻读法国革命史已成为时髦之风。裴多菲在这首诗中阐明了他的革命的人生观。他不愿庸庸碌碌、随波逐流地生存，一代奴隶生下一代奴隶。诗人不愿死在床榻上，不愿生命像树木一样受到蛆虫的咀嚼，不愿像花朵一样被寒霜打落，不愿像蜡烛一样燃尽。诗人怀抱人类解放的崇高信念，愿为被奴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流尽鲜血，死在战场上。诗人愿作一棵傲然屹立的大树，宁肯让霹雳闪电击断大树，电光从他身上穿过，就是化为灰烬，也能在人间留下一颗星火。他愿做峰顶上的岩石，从高山之巅轰轰地倒入峡谷，震撼整个山岳。于是诗人描绘出未来民族解放的宏伟场面：

假如将来所有被奴役的民族
砍断了铁链，挣脱了枷锁，
红红的脸，红红的旗，
旗帜上写着这样的口号：

“全世界的自由！”
被奴役的人民大声怒号，
从东方一直响彻到西方，
审判暴君的日子已经来到！
——《一个念头在烦恼着我》

在这首诗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积极的因素，它不是匈牙利启蒙时期文学中爱国主义思想的简单继续，而是在“全世界的自由！”革命口号中融汇着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高尚理想。裴多非同那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不同，他懂得只有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得到解放，自己民族的解放事业才有保障。于是诗人描绘了他作为一个自由战士的英雄形象，并且发出视死如归的誓言：

假如我必得死亡的话，
我就在战场上阵亡……

当诗人倒下，血从胸中流出，他还要唱一支欢乐的歌。在临终前，他愉快地看着战士们高举着血染的军刀，听着军号响和大炮轰鸣；看着一匹匹的战马在火线上飞奔，踏着他的尸体前进，战士们传送着胜利的捷报。于是诗人在本篇的最后一段中写道：

到了举行伟大葬仪的日子，
把我的破碎了的骨骸收殓，
缓慢地唱着挽歌；再用大旗
覆盖着我的神圣的灵柩；

这是诗人豪放的誓言，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诗人写得很沉痛，很悲壮；写出了他那为“全世界的自由！”而斗争的场面，也写出了他和他同时代的进步人士的共同心声。

由于政治内容过于强烈，在他的后期的爱情诗中，就很难区别哪一些是爱情诗，哪一些是政治诗。例如《凄凉的秋风在树林中低语》，一八九一年匈牙利文学史家赫瓦什·奥道尔夫就把它编入裴多菲的爱情诗中，原因是诗中多次出现对他妻子尤丽亚的描写。我也认为，这首诗应划为爱情诗的范围之内。我们且看这首诗的第一段吧：

凄凉的秋风在树林中低语，
轻轻地谈些什么？却听不见；
究竟谈的是什么呢？那树木
摇着它的头——那低垂的树冠。
我安闲地在安乐椅上躺着……
我妻子的头靠在我的胸旁，
她静静地、甜蜜地睡着了。

这是裴多菲与尤丽亚在科尔顿度蜜月，过着悠闲而幸福的生活时期写成的。从诗的首段来看，似乎只是对秋天萧条的大自然的景物的描写，而且带有浓

厚的秋后万物凋零的阴沉情趣。诗的基调是低落的，但是写到第二节，诗人却抒发出他对欧洲革命，特别是法国革命的向往与崇敬：

一本描写自由斗争的历史，
它的每一个字母像彗星一样。
迅速地穿过我的崇高的心灵……

从诗的开头来看，似乎出现一片暴风雨来临前的沉静。在死一般的沉静中，迸发出霹雳闪电和雷鸣。正如他后来在三月十七日《日记抄》中所写：“好多年以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成了我唯一的读物、我的晨祷和晚祷的祈祷文、我每天不可缺少的食粮。”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激励着诗人前进，引导着被奴役、被压迫的民族向革命迈进。诗人从蓝色的多瑙河想象着遥远的塞纳河，在法兰西和匈牙利人民浴血奋战的壮丽历史描绘中，表现出诗人对于未来自由斗争的渴望与献身精神。

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裴多菲的革命现实主义的诗题材显著增多，爱情诗相对地减少了。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只写了二十二首献给他妻子的爱情诗。这些作品明显地跳出了他个人的狭窄的抒情，紧密地配合着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步伐，形成了他个人的抒情与民族精神的高度融合的特点。例如，在三月十五日佩斯起义前夕，裴多菲让他的妻子缝制一面大旗，以迎接革命的来临：

你在干什么，你在缝什么？
你在缝补我的那件衣裳吗？
我对破烂衣裳已十分满意，
我的妻子，你还是缝起一面战旗！
——《旗帜》

在三月佩斯起义的日子里，森德莱·尤丽亚同样是一位革命者，例如三月十三日晚上，裴多菲伏案写作《民族之歌》，她却在缝制民族的帽子和民族的旗帜。裴多菲与尤丽亚从结识起，特别是从一八四七年一月写下《自由与爱情》的革命箴言诗开始，诗人都在引导她向革命迈进，使她跳出庄园主家庭出身的局限，努力理解民族解放与全人类解放的重大意义。我们再看《旗帜》一诗的三节：

这样下去，不要太长的时间，
我预感时局将会发生突变，
就一跃而起向战场上跑去，
我的妻子，你缝起那面战旗！

裴多菲的革命活动和献给她的充满着强烈政治内容的爱情诗，对她的思想转化起着巨大的作用。她用心思索，努力读书；在革命的岁月里，她成了裴多菲最亲密的战友和助手，这就使诗人毫无顾虑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我们再看裴多菲在三月十七日写的《日记抄》，对于了解尤丽亚的先进的思想，就更加清楚了。

大半夜的时间，我和我的妻子——我心爱的、勇敢的鼓舞者都没有睡着；她时时刻刻在鼓舞着我。她走在我的思想和计划的前面，正像一面军旗在队伍前面迎风招展。……那就是应当行动起来。就在明天，后天也许已经太迟了。

这也许是裴多菲对他的妻子森德莱·尤丽亚的过分的夸奖，诗的语言不是那么科学与准确，但是尤丽亚作为十九世纪的女性，确实具备了她的先进思想。

“自由与爱情”作为诗歌创作的主题，贯穿着裴多菲的战斗的一生。到了后期，他的爱情诗就更易于被我们接受，同我们的时代就更接近一些。例如他的《告别》一诗，就是裴多菲刚从战地归来，又要同他的妻子告别时写成的：

黎明刚刚来临，黄昏又要逼近，
我刚刚回到家里，马上就要离去，
我刚刚回来，刚刚向你热烈祝贺，
就要分开了，就要向你最后道别。
上帝保佑！我美丽的年轻的妻子，
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
我的生命！

在这首诗中，出现那么多“刚刚”，这说明时间的宝贵与紧张的战情的催促。经过激战之后，诗人返回佩斯探望亲人，这是何等的宝贵啊！裴多菲同他的妻子促膝谈心，他说他从前是诗人，现在已经成了一名千锤百炼的战士。他从前拿着竖琴，现在手中紧握宝剑，而且诗人越来越看到欧洲革命的光明前景：

从一颗金色的星引导我向前，
现在一片北极光照耀我前进的路程。

裴多菲在革命的征途中信心更足，眼睛更亮了。欧洲革命的大好形势鼓舞与振奋着诗人的心灵，从“一颗金色的星”的光芒，到“一片北极光”染遍欧洲上空，说明欧洲革命的火焰日益蔓延，给予了诗人以战斗的勇气和信心。接着诗人在同他的妻子谈起他奔赴疆场的目的：

不是光荣的欲望使我离开了你，
你知道：它在我心中早已消亡，
假如需要，我愿为祖国流尽鲜血，
为了祖国，我才走上流血的战场。

在革命战争进行到紧要关头，一些匈牙利军官的叛变，使革命遭到严重的挫折。大批的逃兵与叛徒的出现，使裴多菲无比愤慨与仇恨。但是在战争的烈火中，真正冲杀起来保卫祖国的，却是千百万的贫苦农民与工人。即使谁都

不去保卫自己的祖国，诗人发誓他一个人也要保卫到底，而且他的爱情永远那样年轻与火热：

……那时我将带回来
我的完整无损的忠实的爱情。
上帝保佑！我美丽的年轻的妻子，
我的心，我的爱情，我的灵魂，我的生命！

在这里，我们应该提到他后期的优秀的诗篇《我又听到云雀在歌唱》。这是裴多菲在激战之后，从贝姆部队里寄给他妻子尤丽亚的最后一首爱情诗：

我又听到云雀在歌唱！
我已经早就把它忘掉；
唱吧，你春天的使者，
唱吧，你可爱的小鸟！
啊，这使我多么喜欢，
激战之后，听到这歌声，
正如山涧清凉的流水，
洗濯着我火热的伤痕。

云雀是和平的象征。正义战争会给人类带来和平的幸福生活。然而和平的幸福生活，又必须以暴力革命才能获得。这首诗是在诗人参加、由贝姆将军指挥的“五次血流成河”的激战之后写成的。子弹呼啸与火炮轰响声停息了，听到云雀的歌声，使诗人的心灵中充满着希望与欢乐，恰似玫瑰花重新开放，生满着茂密的枝叶，遮盖着诗人沉醉的心：

由于你唱起欢乐的歌声，
使我记起了诗歌和爱情；
在过去和未来的日子里，
我常常怀恋这两位女神。

森德莱·尤丽亚的忠实的爱情给诗人以无限的勇敢和希望的力量，而且他们的爱情的幸福生活是同民族独立与自由融汇在一起的。在裴多菲的诗中两者绝不可分离。这就使裴多菲和尤丽亚在革命的道路上，互相起着推进的作用，增添向革命迈进的力量和希望的信心。本篇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内容，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也颇为新颖，给人们以强烈的生活美感。情景交融，感情真挚，我们似乎看到了战争过后，将出现一片崭新的幻想世界的图景。

热情的裴多菲面对革命惨败的局势，他仍唤起民族感情，发扬民族精神，充满暴风雨的激情，激昂悲壮的调子，高呼着民族的独立。他对他妻子森德莱·尤丽亚的怀恋就更加深厚和明显了。我们且看他的《我正在男子的壮年时期》的最后一节吧——

爱我吧，爱我吧，像我爱你那样，
像我的爱情那样热烈无边……

你向我发出了光，发出了热，
它从上帝的脸上积聚在你的心间……
你的心灵是我惟一欢乐的世界……
你是我黑夜的星，白昼的太阳……
假如你不爱我，明亮的星啊，
生命多么凄苦，世界多么黑暗！

革命失败的惨局已定，他先前的战友一个跟着一个地靠拢资产阶级议会，他后来的知心战友只有两人：贝姆将军和阿兰尼·雅诺什。他的诗又出现了《云》的组诗创作前后的那种消沉和重返爱情与大自然的阴冷情调；尽管如此，裴多菲仍不愧是一只迎风展翅的海燕！

关于政治诗

关于裴多菲的政治诗，这里指的是他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政治抒情诗、佩斯起义时期的政治鼓动诗、历史题材的讽喻诗、描写战士们前仆后继的抒情诗等，但他的几部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长诗除外。

裴多菲是劳动人民自己的诗人。一八四二年他开始发表作品，他的诗就深深扎根于群众当中。他早期的诗歌中，就已经渗透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虽然那时他还不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但是他那纯朴的心灵已经深感祖国在遭受奥地利殖民统治者的压迫与贵族地主阶级的剥削。一八四四年开始，他创作的政治抒情诗《爱国者之歌》、《反对国王》、《贵族》、《琴与剑》等，就表达了他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爱国者之歌》中，诗人采用简单明白的语言表达了他热爱祖国的感情。他把自己比喻成一座教堂，把祖国比喻成神坛，长久地在他的心灵中供奉。诗人发出誓言，为了保卫作为神坛形象的祖国，他愿意毁灭自己的生命。甚至诗人发出这样的誓言，在他为祖国而牺牲时，他仍然虔诚地祷告：

我的上帝啊，给祖国祝福吧，
祝福我的祖国吧，我的上帝！
在全世界上，
只有你才是我最亲爱的！

在这首诗中他发誓爱国主义思想永远不变。当祖国上空的阴云越来越浓重，他的心灵也就越来越凄凉，爱国的心也就更加深切。这首诗在一八四四年一月间发表，当时进步作家和评论家们并未真正理解它的重大意义，因为像这样一类的爱国主义题材的作品，他的前辈诗人们都曾经写过，直到三月十五日革命爆发，甚至诗人阵亡以后，他早期的爱国主义的箴言诗后人才给予高度的正确评价，才看到他的诗与他作为革命战士的行动的高度统一。他的爱国誓言历史证明已化为实际的革命力量。提起裴多菲政治抒情诗，一般都是从《爱国者之歌》算起。

一八四四年一月间，裴多菲在匈牙利第二大城市德布勒森落得孤身一人，栖息在一个破烂的草棚里。就在这里，他写下了第二首政治讽喻诗《贵族》。诗人采用嬉笑怒骂的讽刺手法，嘲弄一个贵族地主的愚蠢、野蛮和无知。裴多菲把这个无赖的丑恶心理状态，描写得惟妙惟肖。且看这个贵族怎样叫喊吧：

这恶棍却反抗着叫喊：
“你们不能打我！
我是贵族……你们无法无天，
竟敢鞭打一个贵族老爷。”

匈牙利封建社会的贵族地主肆无忌惮地鞭打农奴，而且受到官方法律的保护；反过来，农奴鞭打贵族，要受法律惩处，下狱或者杀头。裴多菲写下这样鼓动农民造反的诗，他要承担着多大的风险！匈牙利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家们，曾经创作过贵族阶级的贪婪、腐化、落后、愚昧等方面的讽喻作品，例

如秋柯诺依·维德兹·米哈依的讽刺喜剧《捷姆比菲依》中，作者阐明了贵族地主是社会发展的障碍；但是如何清除这些“障碍物”，秋柯诺依便束手无策。法则考什·米哈依的长诗《牧鹅少年马季》尽管突破了贵族文学中传统的描写“高尚人物”的界限，刻画出马季三次暴打地主的精彩场面，但是作者笔下的人物毕竟是个人的复仇和孤军奋战的典型。裴多菲却不同，他号召奴隶们共同起来反抗旧世界。例如《贵族》的最后一节，诗人描写那个无赖不管怎样叫喊和反抗，也阻止不了起义群众的行动，愤怒的火焰越烧越烈。裴多菲对这个恶棍的下场，描写得淋漓尽致，读起来大快人心：

受辱的祖先的游灵呀！
你可听到那咒骂的话？
现在他不在鞭刑柱上了，
他已被吊上了绞刑架！

从鞭刑柱上卸下这个恶棍，再把他吊上绞刑架，这是诗人对奴隶起义的歌颂。在封建社会里，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从未停止过；它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贵族》这首小诗，仅有二十行；它像匕首一样锋利，击中了统治者的要害。不论它的内容还是形式，都是诗人前期最成功的政治讽喻诗，是他流落在德布勒森时期的重要收获。

这一时期，还要提到他的另一首极为重要的政治诗《反对国王》，它的斗争矛头直指奥皇斐迪南一世；

国王们哟，你们从宝座上滚下来吧，
从你们头上把王冠抛向地面！
假如你们不卸下，那我们就动手，
我们就奋起砸碎你们的头和王冠。
只有这样的下场。一把大斧子
在巴黎广场上将路易的头砍下，
这是暴风雨中的第一道闪电，
它照亮了你们，为你们而爆发。

年仅二十二岁的裴多菲以大无畏的精神，歌颂巴黎人民于一七九三年将法国暴君路易十六押上断头台的伟大创举。法国大革命给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谋求解放作出了光辉的榜样。它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现出一幅幻想世界的图景，使各国千百万先进人物去追求它，探索它，剖析它，甚至为它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匈牙利，十八世纪末期，启蒙文学运动中出现的匈牙利雅各宾党作家，就是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培育下，为了在匈牙利建立共和制而斗争的作家团体。雅各宾党作家巴恰尼·雅诺什、考岑奇·费伦茨等人被反动当局投入监狱，巴恰尼·雅诺什被判处死刑。裴多菲对匈牙利文学的先驱者们倍加崇敬和爱戴，特别是巴恰尼·雅诺什的著名诗篇《法兰西的变迁》和他在狱中所写的一些感人的哀歌，例如《沉思》、《囚徒和飞鸟》、《受苦难的人们》等，都对裴多菲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培育，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裴多菲对他的先驱者们的崇拜和怀念，使他在战争年代完成了著名的长诗《刑场》（1848年），以深厚的感情辘轳为祖国捐躯的先烈们。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初期，裴多菲就预感到全世界必将爆发像巴黎一七八九年那样的革命运动。那时各国人民革命的爆发，统治者们必将得到这样的下场：

那时候，全世界变成一座森林，
国王就成了大森林里的野兽，
我们追逐他们，手里拿着武器，
奔跑着，愉快地向他们射击。

态度明朗，诗句流畅，叙述中夹带着讥嘲，表达了人民起义的无限欢快的场面。人民的幼稚年代已经过去，以武装斗争掌握自己命运的时机已经到来了。一八三一年波兰起义，极大地鼓舞着诗人。他傲视封建统治者，并且声称王国本来就是儿童手中的“玩具”，是“木偶”，一触即倒。

这一时期，裴多菲还写下怀念民族英雄的诗篇《莱赫尔将军》。诗的主人公莱赫尔将军是匈牙利国家的奠基人之一，他自幼在匈奴国王阿蒂拉的宫廷里作为人质，阿蒂拉王死后，他率领马扎尔部落西征，冲破各种困难，历经艰辛，战胜最凶猛的敌人日耳曼，终于来到多瑙河与蒂萨河之间的广阔的低地一带（即今之匈牙利）定居下来。诗人在诗中表露自己愿意回到一千年以前，愿意出生在那个时代里：

为什么我不出生在一千年以前，
生在阿尔帕德王的统治时期？
那时我就会拿起宝剑或者钢刀，
反抗旧世界，向战场上跑去。

从嬉笑怒骂压迫者的《贵族》到赞扬法国大革命的《反对国王》，从《反对国王》到怀念民族英雄莱赫尔将军，诗人的思想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在《莱赫尔将军》中，表露他愿为祖国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激发了匈牙利民族的自豪感。

一八四四年裴多菲担任《佩斯时装报》助理编辑的职务时期，他写了七首政治抒情诗，虽然数量不多，却表现了他的先进的政治倾向，表达他热爱祖国、反对帝制、向往共和政体的信念，这些诗奠定了诗人的政治讽喻诗的基础。这一时期，他除了担任繁重的编辑工作之外，还日夜攻读法国大革命时期演说家们的论文集和圣——鞠斯特所著《革命精神》一书。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匈牙利的激进的革命青年们，总以巴黎革命为榜样，研究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的经验，以便从中吸取精神力量和营养。裴多菲早期的政治抒情诗，就是他在钻研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和考察祖国黑暗现状的基础上写出来的。

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六年春季，裴多菲的思想正处于“淡淡的哀愁”的时期；也是他追求、探索、彷徨和哀愁的阶段。从他个人精神上来说，他经历了爱德尔卡的爱情悲剧和对麦德尼阿斯基·伯尔娜的求爱而遭拒绝的苦恼；更重要的是他对祖国和民族前途的担忧，一种“绝望”的阴云笼罩着诗人的心灵。他的这种悲观、绝望、矛盾、愤慨和痛苦追求的心情，集中反映在他所著的《云》组诗当中。这些短诗具有欧洲革命风暴来临前的时代的特征。这位人民的忠实的儿子，受到欧洲革命浪潮的冲击，对摧毁匈牙利封建

制度的信念越来越坚定，勇气越来越足了。于是他想到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神圣的职责，以笔为武器同敌人斗争：

父亲，你老是鼓励我，
让我把你的事业来继承。
做一个杀猪宰牛的屠夫，你的儿子却成了诗人。
你用你的钢刀杀牛，
我用我的笔刺杀敌人，
职业的名称虽然不同，
做的却是同样的事情。

——《我父亲的和我的职业》

裴多菲作为一个诗人，他宣布自己是“大自然中一枝多刺的艳丽的野花”，愿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大自然：

诗人的心是一座花园，
它生长出绚丽的花朵，
它把鲜花献给大自然，
留给自己是枯枝败叶。

诗人的心灵是一只蝴蝶，
可怜的蝴蝶！你会死亡：
你在荒凉的花园中飘泊，
直到荆棘给你留下重伤。

园子荒凉！蝴蝶受了伤！
现在有谁来把你们纪念？
只有我这个穷苦的诗人，
为你们献上烈士的花环。

裴多菲所处的“淡淡的哀愁”的时期是比较短暂的，他没有失去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向往与憧憬。在他研究法国革命历史，特别是在他掌握了黑格尔左派的辩证法之后，他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和变化中，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他于一八四五年十二月间写的《希望》一诗，集中反映了他的哀愁阶段的特征：

什么是希望？它是可恶的妓女，
不管谁，它都同样地拥抱。
当你失去了无价之宝：青春，
它就马上把你一下子抛掉。

在《希望》一诗中，充满着绝望。这是他思想上阴冷的一面。一九二五年，这首小诗被鲁迅引用在他的散文诗集《野草》第七篇《希望》中，说明当时鲁迅的思想同裴多菲的思想是相吻合的，而且受到裴多菲的较深的影响。但

是裴多菲在写作《云》组诗后期，他却摆脱了形而上学的观点，从“绝望”中看到了光明。例如，他于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七日写成的《旅行书简》第十四封信，写下了他的名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译），意思是说，绝望是骗人的，希望也是骗人的，皆不足以相信。

裴多菲深感哈布斯堡王朝的黑暗势力的雄厚，这种感觉和估计是完全符合当时匈牙利的现实情况。他一方面大无畏地进行战斗，抨击黑暗势力，写下《我的歌》等革命诗篇；另一方面又感到孤军作战和精神空虚。有时在他的头脑中泛起“绝望”的微波，有时诗人又表现出不畏强暴的英勇精神：

还忍耐什么，受苦的奴隶们？
为什么不起来，不砸断铁链？
只是等待着……难道上帝的恩惠，
能把铁链从你们的手上锈断？
我的歌啊，你在这时候产生，
当霹雳轰击着我的愤怒的心。

——《我的歌》

这是一首号召奴隶起义的诗。特别是在本篇的最后一节中，他以激昂悲壮的调子号召奴隶们起来砸碎镣铐。由于这段诗的革命性过于强烈，它在发表时被书报审查官路斯塔尔·卡洛依用红笔勾掉，并签署：“删去最后一节，才可发表。”阴云蒙上了诗人的愁苦心灵，他唱出了这样愤怒不平的歌声。诗人的积极战斗精神和他对革命前途的坚定信念，在《我的歌》一诗中表现得更加充分了。

一八四六年裴多菲在写作《云》组诗时，还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他当时的世界观的发展来看，还不能正确地解释社会生活的现象，更不能正确地解释和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裴多菲对人民的力量估计不足，这是他产生“绝望”的主要根源。一八四六年底，裴多菲结束了他的短暂的“淡淡的哀愁”，并以实际行动开始向革命迈进。他组织起“十人协会”和匈牙利第一个作家团体“青年匈牙利”，出版了宣传民主思想的《生活景象》杂志。作家协会和“十人协会”的建立，增添了他从事革命活动的力量。他的“孤独”与“哀愁”逐渐减弱，革命的毅力日益增强。这一时期，他不仅从事“诗歌革命”，而且对祖国的前途深为关心。在他起草的“十人协会”的纲领中明确地指出：“……我们不要在国家这只破鞋子上，永远用补丁上面打补丁的方法来修理了，我们要把国家从头到脚修饰一新……”这就是说，裴多菲反对贵族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要求实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八四六年十一月间，裴多菲写下了誓死同暴政决战、歌颂古代叛逆者的诗篇《灵魂不会死亡》，他把自己比作罗马共和主义者、杀死暴君凯撒大帝的开西乌思，比作十四世纪瑞士的爱国主义者威廉·退尔，又比作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卡米列·德慕朗：

我相信，灵魂不会死去，
但它不能跨进另一个世界，
只能下面，在大地上停留，
在大地上生存，在大地上流浪。

我就生活在他们中间。我记得：
在罗马，我愿意是开西乌思，
在瑞士，我愿意是威廉·退尔，
在巴黎，我愿意是卡米列·德慕朗……
在这里，我也许要成为什么人呢！

一八四七年裴多菲的创作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确定以政治诗为主体的新方向。一月至二月间，他写下一系列的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抒情诗。例如《男人，应当有男人的骨气》、《致十九世纪的诗人》、《宫殿与草棚》、《我是匈牙利人》、《悲哀的夜》以及《狗的歌》和《狼的歌》等，就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他在《男人，应当有男人的骨气》一诗中，表达了他不愿做奴隶的信念：做人就要有做人的权利，不能像傀儡一般地被别人摆弄，更不能听信命运的支配。他号召人民要行动起来，他反对只说不做，而且要坚持自己的原则。正如他在本篇第三节中所说：

男人，应当有男人的勇气，
有自己的原则和自己的信仰；
也许当你说出了这些真理，
你的头颅会落到断头台上。
为了一片面包出卖自己，
他永远被后代子孙瞧不起；
你要牢记这样一句话：
“我虽然穷苦，但我独立！”

裴多菲热情地为反对殖民政策和封建制度而斗争，要求废黜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他十分称赞十八世纪法国革命斗争，认为这不仅是在口头上，而且是在实际行动中改造旧社会的伟大创举，是“一把大斧子在巴黎广场上将路易的头砍下”（《反对国王》）的重大事件。一八四七年二月，裴多菲写下了歌颂一五一四年匈牙利农民起义领袖多热·久尔吉的诗篇《为了人民》，开头就向贵族地主阶级发出这样的挑战：

人民还在要求，你们快给他们！
难道你们不晓得，人民是多么可怕？
一旦起来，他们不再要求，而是夺取！
你们没有听说过多热·久尔吉这个人？
你们在烧得火红的宝座上把他活活烤死，
可是你们永远烧不死他的勇敢精神，
因为他本人就是火；你们可要小心：
这火焰能把你们骤然间化成灰烬！

诗人在《为了人民》一诗中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质问统治者：“为什么只有你们有权利？”、“为什么你们有这样的特权？”，人民在流血流汗，创造出来的财富，却为特权阶层私有；劳动人民用双手开采出来的财宝，却装进

了特权阶层的仓库。他的诗歌创作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抨击了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的大贵族地主阶级的罪恶。裴多菲还力求运用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诗歌语言进行创作，以便在群众中得到较广泛的流传，起到唤起群众改造社会的作用。所以他的诗歌的人民性，不仅表现在他采用民歌体写诗，而且他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和劳苦大众一起观察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号召群众走出“草棚”，组织起来手持钢叉、铁铲、镰刀……，打倒“宫殿”；用一条时髦的领带——绞绳，把他们统统吊死：

亿万人民哟！你们走出茅屋，
奔向战场！
拿起你们的镐头、铁锹……
抡起铁铲！
——《光荣的大老爷们》

诗人的预言完全正确。一八四八年爆发的革命战争，不正是那些手无寸铁的农奴们同贵族地主阶级进行斗争，放火烧掉庄园，平分地主财产，吊打恶棍，于得热火朝天吗！所以诗人在三月十五日佩斯起义前夕所写的《光荣的大老爷们》一诗，就是号召贫苦农民起来，同贵族老爷们进行斗争，鼓励他们用生产工具同压迫者厮拼。我们且看这首诗的第五节吧：

一千年以来，老爷们靠我们养活，
已经胖起；
现在我们的狗胖起来了，吃的是
他们的尸体！
我们用铁叉把他们挑起来，
抛进垃圾堆，
在那里，让野狗们进一美餐，
吃得丰美！

把群众的语言加以诗化，这是裴多菲的政治鼓动诗的一个特点。他采用流畅易懂的大众语言，而且没有破坏诗的形象。全诗明朗爽快，内容扎实，语言锋利，采用古老民歌形式，易于群众背诵。他的政治诗多么锋芒毕露和一针见血啊！

裴多菲在三月佩斯起义时期所写的诗，高度概括了匈牙利人民起义的重大的历史意义。他领导的佩斯起义是匈牙利历史上一次巨大的飞跃，动摇了大贵族地主阶级的长期统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为一九一九年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夜，裴多菲就以喜悦的心情迎接革命的来临：

一八四八年！一颗新的星，
出现在空中；红色的光线
投射到黯淡的自由的脸上，
使生命获得了复苏的力量。
——《一八四八年》

裴多菲称一八四八年革命为“新的救世主”，它降临人间，像“战场上的鹞鹰拍击翅膀，狂喜地飞翔在大气层中”，给人类带来幸福和希望。他把自己的一切希望和理想，同革命紧紧地连在一起。他把奴隶们看成是能够使腐朽的社会求得再生的惟一的力量。在汹涌的革命浪潮中，诗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必须举起宝剑，砍断铁链，才能获得独立与自由，胜利必须以鲜血来换取。但是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大贵族地主阶级反对革命，甚至那些中等贵族和贪生怕死的农奴也动摇起来，正如裴多菲在《民族之歌》第三节中指出：

假如有谁把他渺小的生命，
看得比他的祖国还要贵重，
祖国需要时，他不肯战死，
那他太下贱，太卑鄙无耻！

按照匈牙利文的意思“民族之歌”也可解释为“国歌”。实际上，在奥匈帝国与霍尔蒂反动统治时期，《民族之歌》在匈牙利人民的心目中，已经成为非正式的“国歌”，它鼓舞着人们为祖国的解放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就诗的形式来说，诗人是采用古老的民歌形式写成的，其诗情越来越激昂，笔锋越来越锐利，在内容、情节、布局、韵律等方面，都在每节最后的复句中达到了高潮：

向匈牙利人的上帝宣誓，
我们宣誓，
我们宣誓：我们
不再继续作奴隶！

“我们不再继续作奴隶”，这是全诗最要害的句子，是全诗的灵魂，也是裴多菲发动三月十五日佩斯起义的目的。裴多菲在民族博物馆前朗诵时，起义队伍中高呼的口号和佩斯街头贴出的标语，皆为“我们不再继续做奴隶”这一诗句。这说明全诗的高潮在于每节的末句，它标志着起义群众的战斗目标。

裴多菲在佩斯起义的日子里所完成的诗篇，例如《民族之歌》、《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自由颂》、《大海沸腾了》、《给国王们》等，被后人称为“三月诗章”；它们是裴多菲诗歌作品中的精华。这些作品不仅是诗人参加革命斗争的真实的记录，而且是他以不朽的艺术手法，高度地概括了起义时期的社会特征，塑造了各民族团结一致、为摧毁封建制度而战斗的集体的英雄形象。他在《自由颂》一诗中，就表达了匈牙利人民共同奋斗的决心：

不要怕！我们保卫你……我只说一句：
举起你的大旗，挥舞你的大旗！
千百万大军跟在你后面进击。
我们准备阵亡，或者获得胜利！

假如我们一个不剩地死了，

深更半夜，我们爬出墓园，
我们一群幽灵……同那些
取得胜利的敌人死拼一场！

正如裴多菲在《准备好吧，我的祖国！》一诗中，悲痛地陈述匈牙利人民的苦难历史：“我们的眼泪，好像是第二道多瑙河，一直流经我们的祖国”，“三百年以来，哈布斯堡王朝残酷地统治着我们的祖国。”从那时起，匈牙利的国土四分五裂，没有统一的意志，更没有统一的思想。

在佩斯起义后的一段时期里，裴多菲的诗歌创作集中指向国王，鞭打封建社会最高的统治者。他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给国王们》、《国王与刽子手》等诗篇。裴多菲把历史故事与现实的讽刺题材巧妙地结合起来，不仅引起匈牙利人民对自己苦难的历史的回忆，而且加强了诗的战斗性，促使人们积极地投入当前的革命洪流中去。《国王与刽子手》就是一首以历史题材写成的优秀的诗篇；不仅它的内容较好，而且形式也较新颖。这首仅有三十六行的小型叙事诗，把国王与刽子手的淫乱、残暴、狡猾与专横等方面刻画得淋漓尽致：

妄自尊大的国王
在宝座上昂首高坐，
老爷们（下贱的侍从们！）
环护他，舔着他的手。

同时诗人兴之所至，感情激奋，对人民起义倍加称赞：

宝座开始摇晃……
难道是地震爆发？
地震：这是人民起义！
它明显地日益扩大。

于是诗人以欢快的笔调抒发他对人民起义的无限赞美的感情，描写了人民起义的威力：

像河水冲破堤岸，
人民挣脱了铁链，
砸烂后铸成武器，
人民手中紧握刀剑。

裴多菲从匈牙利历史传说中寻求诗歌创作的题材，揭露历代封建王朝皇帝的背信弃义和奸诈行为，以及国王的无人格的丑态和残暴，除了《国王与刽子手》以外，这一时期他还写下《国王的宣誓》、《康多和他的战友们》、《刑场》以及《邦克总督》等诗篇。借古喻今，是诗人写作这一类小型叙事诗的目的。其中有的写得很成功，很精悍，有人物活动、对话、旁白，诗人自己的插话，抒情味很足。

在以历史题材创作的小型叙事诗中，《邦克总督》却是一篇优秀的作品。

它的主题是揭露国王狡诈阴险和出卖人民的利益。邦克是十三世纪安德烈二世统治时期匈牙利的一个总督，他为匈牙利人民复仇，密谋杀死了德籍皇后——安德烈二世的妻子盖尔鲁特（1185？—1213年）。诗的情节简单，故事动人，描写细致，很有抒情气氛；采用民歌体写成，又很有文采，每个句子都是那样的和谐：

安德烈二世是一个
软弱无能的国王，
上帝给他创造了
一副怯懦的心肠；
他的妻子操持国政，
开始治理这个国家，
她乘着一辆快马车，
到全国各地视察。

邦克总督这一题材，曾经引起在裴多菲之前的匈牙利作家们的重视。考托诺·尤若夫就写下了与裴多菲的叙事诗同名的大型悲剧，直到现在，几乎每年都在布达佩斯民族剧院上演；它展现出匈牙利人民遭受德国侵略者欺凌的真实的历史。

裴多菲后期的政治抒情诗，紧密地配合着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步伐，描写了匈牙利人民在胜利进军中英勇奋斗的悲壮场面。在他的后期的诗歌中，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人民战争的多彩画面。他以满腔的革命激情讴歌了匈牙利人民英勇战斗的雄姿，无情地揭露了哈布斯堡王朝的侵略和灭绝人性的凶残。在这方面，我们且看他的优秀诗篇《生存或者死亡》一诗：

从喀尔巴阡山到多瑙河下游，
一阵粗野的风暴，一阵怒吼！
匈牙利人血迹斑斑，披头散发，
在暴风雨中屹立，和风暴搏斗。

诗人满怀信心地预示正义战争必胜的光明远景。这一时期的作品，他开始把个人的抒情和对民族解放与独立的讴歌结合起来，一种显明的战斗特色开始形成，反映了欧洲战争中的重大问题，揭示了民族矛盾的本质：

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德国人、斯
洛伐克人、窝拉基亚人，
为什么你们总是狂咬匈牙利人？
从土耳其和鞑靼人入侵，直到今天，
匈牙利人总是紧握军刀保护你们！

——《生存或者死亡》

但是，在匈牙利境内的少数民族，例如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德国人、斯洛伐克人、窝拉基亚人等受奥地利皇室的挑动，曾一度反对匈牙利革命。裴多菲总是以诱导的态度，使他们认识到民族矛盾的本质。但是在一八四八

年匈牙利民族解放战争中，塞克列人却表现了英勇的战斗精神。他曾写下两首诗歌颂他们：

起来，塞克列人，向敌人冲锋！
危害你们，也同样危害我们，
让我们砸碎共同的铁链吧！
我们上了镣铐，不久就该是你们！

匈牙利自卫军连续作战，不断取得胜利。十月七日，自卫军把援助耶拉契奇的奥地利军队层层包围起来，并迫使他们缴械投降。十月十日，匈牙利自卫军追击那拉契奇军队的残部，直逼维也纳瓮城之下。裴多菲的父亲彼得罗维奇·伊斯特万这时已经五十八岁，他仍然作为护国军的旗手战斗在奥地利的边界线上；裴多菲在那里同他父亲相遇，写下了著名诗篇《老旗手》：

这个年老的旗手是谁？
他竟那样热情，英勇无畏……
我骄傲地注视着这位老人，
这老旗手就是我的父亲。

热情的彼得罗维奇，身负重病，“从桌旁到床边，慢慢地移动，却十分勉强”，然而又是什么力量使他奔赴战场，在青年的队伍中奋勇当先呢？因为他，

一贫如洗，没有任何财产，
……
只有穷人才热爱自己的国家。

裴多菲以无限崇敬的心情描绘他父亲死后应得到的荣誉：

难道我再也不能见到你了？
只能听到你死后光辉的荣誉；
我的眼泪是晨露，落在你坟上，
你的荣誉是晒干晨露的太阳！

裴多菲作为一个战士和爱国诗人，具备了对革命前途正确的判断能力。他憧憬未来，充满信心地号召匈牙利人民继续向革命迈进。诗人生活在斗争的激流中，内心不能不引起对时局变化的强烈反响，因此他的诗歌的调子变得越来越激昂，战斗性越来越强——

喇叭鸣，战鼓响，
冲锋队准备上战场。
前进！
子弹呼啸，军刀击响，
鼓舞匈牙利人永向前！

——《战歌》

《战歌》是匈牙利护国军军歌的歌词，是应科苏特的约请而写的。情调悲愤激昂，说出了全体匈牙利官兵们内心的话语。我们再看这首歌词的第四段：

脚下是血染的大地，
战友们被流弹击毙。
前进！
宁肯在战斗中阵亡，
我们决不屈膝投降。
前进！

全篇歌词的最后一句是“假如需要我们牺牲，就牺牲，让祖国永存”。临近决战时，他的诗越来越发挥了它的战斗作用。他的政治抒情诗比较准确地描绘出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发展、失败的全部过程。它们的不朽的价值所在，就在这里。

两部长篇叙事诗

裴多菲一生写下八首长篇叙事诗，这里只介绍他的两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雅诺什勇士》（1848年）和《使徒》（1848年）。

《雅诺什勇士》

《雅诺什勇士》（一译《勇敢的约翰》）是裴多菲的代表性作品，于一八四四年年底用六天时间写成的民间故事诗。这部长诗是裴多菲早期向民歌学习的重要收获，成了他前期“诗歌革命”的最高成就。鲁迅称这部长诗是“匈牙利的一种名作”。全诗长共一千四百八十行。

远在一九一七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指出：“取材于古传，述其人悲欢畸迹”，这是对本篇内容的准确概括。长诗的主人公雅诺什是一个勇敢、善良、热情的农村青年。他自幼失去父母，孤苦地生活着，给本村的地主牧羊。

他在村子尽头的草原上牧羊，周围的野花，像大海的碧波，但他没有心思欣赏花儿，他正迷恋在小河里洗衣服的少女伊露斯卡。雅诺什（即杨奇）用甜言蜜语把姑娘引到河岸上来。他们接吻，不止百次、千次。

伊露斯卡和雅诺什一样，都是孤儿。她落在后母手中，受尽各种折磨。伊露斯卡正在和雅诺什热恋的时候，狠毒的后母心怀歹意，进行破坏。后母张着大嘴，急促地喊道：“卑劣的精灵，你多么下贱！竟敢干出世间最淫荡的勾当？你鬼混时间，竟敢冒犯上帝……”正当后母对伊露斯卡咒骂和威胁的时候，雅诺什挺身而出，无情地痛斥了后母，保护了伊露斯卡，使这个老妖婆败退而去。

这时候，太阳已经接触到地面，雅诺什想起羊群，但只找到羊群中剩下的一半羊，那一半羊跑到哪里，被贼偷了，还是被狼叼去？这时候，雅诺什忧愁万分。他只好赶着剩下的羊群回家。当主人站在大门前清点进圈羊数的时候，发现少了一大半。主人不停地大吐恶言，并且拿起硬木秤杆去追打雅诺什。从此以后，雅诺什离开他的情人，流落在异乡。

雅诺什流落在旷野里。野草像大海在他的四周翻腾，他孤独一人向前走，走到一个湖边，水面红光潋滟，湖边的芦苇被晨曦照得一片通红。只有水鸟在湖面飞翔。他心里充满着巨大的痛苦和忧伤。他疲劳，饥饿，从背囊里取出一小块面包和香肠，咀嚼着，仰望着空中的海市蜃楼。他躺下去，睡着了。睡梦把他送回到遥远的故乡，他似乎躺在伊露斯卡的怀抱里，挨近她的嘴唇，想亲吻，倏然一声霹雳使他从梦中惊醒，倾盆大雨从天而降。雅诺什阔步走进大森林，那里只有乌鸦对他表示欢迎。在他眼前出现一片恐怖的景象。

雅诺什在森林里流浪，遇上一伙匪徒。一道光线射进了他的眼睛，他向光亮处走去。那是一座匪巢，住着十二名强盗。在他面前出现的是匪徒，手枪、长矛；但雅诺什毫不慌张，心神镇定，他壮大胆量，就向匪徒们走近。那匪首便高声叫起：“倒霉鬼！你是谁？有何贵干？你怎么竟敢大胆跨进这门槛。”雅诺什毫不畏惧那匪首的恫吓。匪徒们看中雅诺什是一个有胆量的青年，便劝他加入他们一伙。雅诺什表面上答应了，但他内心却充满复仇的念头。就在匪徒们酗酒醉后，雅诺什放火烧掉了他们的草房，匪徒们全部在火海中葬身。

在烧死匪徒之前，雅诺什曾充满幻想。他想打开匪徒们的宝库，把财宝带回家，他就同伊露斯卡结婚。在村子中央，修建个小屋，他领着新娘子到那里去住，像亚当和夏娃一样过着天国里的幸福生活。伊露斯卡也不再做后母的奴隶了。但是传统的道德观念使雅诺什省悟了。他想，怎么能拿匪徒们抢来的财宝呢？那每一块银币上都沾满了血污，靠这些不义之财，怎能过上幸福生活？！他的良心告诉他，不许他有这种行为。于是他向遥远的情人伊露斯卡呼喊道：

亲爱的伊露斯卡！称承担重负，
为了上帝，你忍受着生命的凄苦！

雅诺什告别匪徒们的骸骨以后，他又登上征途流浪去了。在路上，他遇上了一队慍悍的轻骑，武器闪闪发光，马儿打着响鼻，甩动者长鬃。雅诺什望着这情景沉思默想：“若是能收容我，当一名士兵，我该多么快活！”当雅诺什走到轻骑队长身旁，向队长讲述了自己的身世。他说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愿意参加士兵的行列，去同土耳其人作战。雅诺什的言行，博得轻骑队长的无限喜悦，就马上收容了他。

当雅诺什穿起红色军裤，再把军刀挥向太阳，这时是无法形容他的幸福心情的。他力大无穷，作战英勇，赢得了战友们的赞赏。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能引起许多姑娘对他的钟爱，但是他思念的只有伊露斯卡，这体现了他在爱情上的忠贞与专一。

这支匈牙利轻骑队来到了鞑靼国，受到大公的阻挠，不许穿越他们的国土，由于黑人国王的调解，匈牙利的轻骑队才顺利地通过了鞑靼国境。

这之后长诗的浪漫主义的神话色彩逐渐增多了，故事的发展越来越紧凑。诗人采用一种夸张和跳跃的形式，借以衬托匈牙利人民的坚强性格。诗人的夸张违背了地理环境和正常的气候规律，这是神话传说中允许的描写手法。例如“法兰西和印度是友好毗邻”、“意大利永远是冬天”等等，我们不能按照一般的地理概念和正常的气候规律来解释。例如：

他们就这样踏上波兰国土，
离开了波兰，又奔向印度，
法兰西和印度是友好毗邻，
连接两国的道路却十分险峻。

此处系作者采用虚构和神话的手法描写匈牙利军队艰难的行军路线。

这队匈牙利轻骑兵来到法兰西，支援那里的人民击败了土耳其侵略者。土耳其侵略者在法兰西国土上大肆掠夺，抢走教堂里的黄金和财宝，放火烧掉城市建筑，从宫殿里把国王赶走，又把国王的女儿侮辱。匈牙利军队追击抢劫成性的土耳其士兵。雅诺什在战斗中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杨奇他言行一致，说干就干，
那土耳其总督被他砍成两段——

从马背上倒下：一半倒向左，
一半倒向右；生命就此结束。

裴多菲笔下的雅诺什的英雄形象是一种象征，它说明来自匈牙利社会最底层的劳苦人民敢于同侵略者进行斗争，并且能够战胜人间、天堂、地狱中的一切邪恶。长诗从第十三章开始，就不再出现杨奇这个名字，杨奇被法兰西国王恩赐为雅诺什勇士。诗人以此作为长诗的篇名。

在战场上，雅诺什勇士砍死了土耳其的总督，又从总督儿子的手中营救出法兰西国王的女儿。黄昏时分，雅诺什和国王的女儿一同来到了战场。一片凄凉的景象，一群乌鸦在尸体上面飞旋；湖水通红，因为匈牙利轻骑，正在冲洗被土耳其兵染污的血迹。匈牙利军队完全是一片胜利的景象。法兰西国王为了报答雅诺什救出他的女儿，愿把女儿嫁给他。国王说：

雅诺什勇士！现在你注意倾听：
是你拯救了我女儿的生命；
你娶她做妻子，将是美满的一对，
她做皇后，你就继承我的王位。

法兰西国王不惜以王位与女儿利诱他，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征服雅诺什，他对国王回答道：

国王陛下，感谢你的好意！
对我的奖励，我实在担当不起；
与此同时，我要郑重发表声明：
我不能接受你给我的恩情。

雅诺什勇士对伊露斯卡始终怀着忠贞的爱情，无论到哪里，总是思念他故乡的情人。

雅诺什讲述了自己的身世。他说他是个私生子，在玉米田里被一位心地善良的农妇抱回家，并且抚养长大。那家的男主人言语粗暴经常大发雷霆。他长大了，在干活的时候，稍有差错，或违背指令，那男主人就拿起棍子朝他的头部打来。雅诺什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说：

我就在劳动和拷打中成长，
很少有儿童时代的欢乐时光，
我整个的快乐和惟一的希望——
就是村上一位美丽的金发姑娘。

这段自述是雅诺什对自己经历的高度概括。听到这个自述，谁能无动于衷？国王的女儿流下眼泪，国王向雅诺什召唤道：“我不强迫你和我的女儿结婚……你不能拒绝，我要赠送你一批礼品。”国王打开了宝库，就把财宝装进最大的口袋里作为雅诺什拯救国王的女儿的报酬。国王和军队护送雅诺什来到海边，他乘上帆船向大海漂去，护送的人们喊道：“祝一路平安！”

雅诺什最初在海上航行时，产生了甜蜜的幻想：

伊露斯卡，我心中的姑娘！
你可想到无限欢乐把你等待？
你的未婚夫将带着财宝归来？

雅诺什历经千辛万苦，幻想回到家乡能同伊露斯卡团聚。当他正沉浸于甜蜜的幻想时，红光在天边闪烁，大海翻腾起巨浪，狂风推着浪头向帆船猛烈拍击。倏然乌云来了，旷野一片黑暗，雷声在空中轰响，光波四射，一道电光把帆船击成了碎片。

这时只剩船骨架在海上漂流，巨浪卷去了水手们的尸体。雅诺什在危急面前计上心来，两只手抓住了一块很大的云彩。流云运送他到达海岸边；他放下了手，落在块巉岩顶上。他在那里四处张望，骑上神话传说中的格力夫鸟，飞回到他的故乡。在他返回故乡的途中，他这样思量着：

我没有带回财宝，没有带回黄金，
可是我却带回一颗忠实的心；

……

时间正是秋季，农民们正在收获葡萄。他一直朝伊露斯卡的住房走去。他推门进去，没看见伊露斯卡，这房屋搬来了陌生人家。经过详细询问，知道伊露斯卡受尽折磨后已死去。

伊露斯卡长期受后母虐待，饥饿和重病过早地夺去了她的生命。临终前，她留下这样坚贞的遗言：

我的杨奇，让我们祈祷上帝！
假如你还活着，我死后也属于你。

在这里，诗人不仅是对他所刻画的主人公的爱情的歌颂，也体现了诗人本人的崇高的爱情道德观念。他的爱情诗感人，他同尤丽亚的爱情同样感人。他言行相符，体现了他的人格和作品的高度统一，因此，后人崇拜和敬仰他。正如诗人在战死前八天即一八四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在给他妻子尤丽亚的信中写道：“生前与死后永远忠于你的丈夫”，这一誓言一直被匈牙利青年一代铭记不忘。

雅诺什勇士怀着悲痛离开故乡，重新登上流浪的征途。临别前，他来到伊露斯卡坟前，从她的坟前摘下一朵傲然怒放的玫瑰花。路上他对小花这样说：

孤零零的花呀！你从骨灰中生长，
你是我流浪途中忠实的伙伴；

一路上，雅诺什勇士遇到了一个比一个更加险峻的境域，接受各种恶运的考验。

雅诺什跨进了巨人国，那巨人国的卫兵看见了雅诺什勇士，就向他喊叫：

“草丛中有人蠕动，让我察看；我的脚发痒了，等着，要把你踩烂。”那巨人迈着大步向雅诺什勇士走近，雅诺什拔剑，那巨人被剑砍倒在河流中间。雅诺什往前走，见到黑色的宫殿，国王宴请他石餐，借此机会雅诺什便动手：

一大块石头落在国王的前额，
他的头碎了，脑髓四下喷射。

雅诺什勇士笑着说道：“这回你可塞住喉咙，吃个饱，胀坏了你的脑壳！”国王被打死以后，巨人们都向雅诺什勇士求饶。他以机智和勇敢战胜了国王的威胁和利诱，限制了力大无穷的巨人。

雅诺什勇士离开巨人国，又奔向黑暗国。他看见一群巫婆在那里骑着笤帚飞驰。她们在岩洞里过着丑恶的生活：

许多老巫婆在那里乱挤乱爬，
她们向锅里投着老鼠头、癞蛤蟆……
绞刑架下生长的野草和花朵，
还有猫尾巴、人的头盖骨和毒蛇。

在巫婆当中，就有伊露斯卡的后母。她是丑恶势力的代表者。雅诺什勇士一眼认出了她，就命令把她抓住。当一把抓住这个女妖，就把她投入大气层中，她的下场是：

人人都对她表示憎恨和厌恶，
就连乌鸦也不为她歌唱葬歌。

伊露斯卡的后母太丑恶了，包括她的心灵和肉体。由于嫌恶，死后连乌鸦都不啄食她的尸体。

雅诺什勇士离开黑暗国，向旷野里流浪。他拿着那朵从伊露斯卡坟前摘下的玫瑰花，心里充满着甜蜜的回忆。他累了，躺下去睡着了。这里正是坟场。午夜时分，每一座坟墓都张开了嘴巴，一群披着白纱的幽灵从坟墓中上升。它们跳舞，唱歌；其中一个认出了雅诺什勇士，可是晨鸡的啼叫声驱散了这一大群幽灵。雅诺什勇士从梦中醒来，绝望地向前走去，走去了。

雅诺什越过奥帕兰加海洋，去寻求乐土去了。他登上一架大山，看到红光普照四野。他来到海边，又见到一所打渔人住的房子，他就要求那位渔翁把他送到大海彼岸。

雅诺什勇士很早就对奥帕兰加海洋怀着幻想，一个巨人背着他渡过了海洋。在大海的那一边，是仙人国。可是，三只白熊守卫着那里的第一道门。他一口气把三只白熊干掉。在第二道门旁，三只雄狮又毙于他的剑锋下。在第三道门旁，一条大龙被他剖腹。

雅诺什勇士进入仙人国后看见一片欢乐景象：

仙人国里没有冬季的严寒，
他们在那里度着永恒的春天；

仙人和仙女在天国里生活，不懂得死亡，只是幸福地生活，只有爱情和甜蜜的吻滋养他们。在仙人国的中央有一泓湖水，雅诺什勇士把从伊露斯卡坟前摘下的小花投入水中，那复苏生命的泉水使小花变成了伊露斯卡，她复活了。伊露斯卡成了皇后，雅诺什勇士成了国王。

裴多菲在《雅诺什勇士》中所追求的世界，实质上是以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而勾勒出来的理想社会的图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里，它有一定的鼓舞和教育作用。

《使徒》

一八四八年六月至九月间，匈牙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最激烈的时期，裴多菲完成了他后期的政纲性的长诗《使徒》。全诗由二十章组成，共二千九百二十一行。

从第一章开始到第四章为止，叙述长诗主人公锡尔维斯特一家四口的苦难生活。长诗的故事是从首都的外城之夜开始的，这个家庭充满着暗淡、冷清、贫困的气氛。锡尔维斯特一家栖息在一所顶楼里，室内充满阴冷、潮湿、霉气味。妻子抱着她的最小的儿子坐在床头，可怜的婴孩嘶哑地哭号着，吮着母亲于瘪的乳头。那家的主人——锡尔维斯特沉思地注视着未来的世界，他的目光像山鹰般地在空中飞翔。他的大儿子从床上爬起来，喃喃地说道：

爸爸，我要吃饭呀！
我强迫自己睡觉，
我强迫自己，但是我睡不着啊！
爸爸，我饿呀，给我面包，
就是给我看看，不吃我也高兴！

故事采用父子对话的形式，控诉了人类的不平等以及贫富生活的差别。

长诗从第五章开始，叙述锡尔维斯特的身世。他原来是一个被悄悄投进车厢里的私生子。车夫把他带走，并把他放在城郊一所简陋的酒店的门槛上。当一个酗酒的老头子走出酒店，突然跌了一跤，绊倒在孩子身上。老头子把孩子抱回了家，交给一位女邻居喂养。这个老头子对孩子的希望，是把他培养成一个小偷：

好啊，好啊！七八年以后，
让他学小偷。我把他培养成一个
像基督一样聪明的小偷！

接着便是给孩子行洗礼，起名叫锡尔维斯特。长诗主人公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意思是“除夕”。当锡尔维斯特长到四岁时，他就从小商贩的手中偷了许多水果，又从讨饭瞎子的帽子里偷了许多铜板。当他偷东西回来的时候，老头子对他大加称赞，分给他面包吃；可是当锡尔维斯特什么都偷不到的时候，老头子就向他大发雷霆。锡尔维斯特渐渐长大了，觉得去偷窃感到良心有愧，从此他就不想再去偷窃。由于老头子是教唆犯，罪不容诛，被判处了死刑。

长诗从第七章开始，叙述锡尔维斯特流落街头的悲惨情景：

他走着，看着热闹，望着市面……
他已经疲劳不堪。
他找到一个街角，
躺下去，头枕着一块石砖。

锡尔维斯特睡着了。当他从绝望中惊醒，已经是深夜。一个老巫婆站在他面前，两眼盯着他，并且要把他带走。于是锡尔维斯特说出了自己的身世：

我叫锡尔维斯特……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我是私生子，一位老太婆在街上把我收下……

一天夜里，锡尔维斯特遇见一个老巫婆，她把他领回了家，和狗一起住在厨房里，和狗盖一个毯子。他和狗建立了友谊。老巫婆让他去讨饭，教他如何取得贵族老爷们的同情与怜悯：低下头，皱起眉头，张开嘴用唾沫润湿眼睛，再念叨病中的母亲和上帝的圣名。老巫婆反复教他各种讨饭的动作，他的聪明伶俐，引起老巫婆的喜欢。

锡尔维斯特长到六岁时，他并没有童年的幸福，越来越感到自己是一个不幸的孤儿。讨饭的生活，已经过去了两年。在一个深秋的夜晚，他赤着脚，光着头，站在泥泞的街道上向过路人乞求的时候，一个贵族老爷走来，把他领到庄园，做仆人去了。锡尔维斯特来到庄园，给他安排伺候少爷的工作。少爷发出命令，他马上就完成。他给少爷梳头，稍不称心，少爷就把梳子夺过来打他的耳光。行路时，少爷故意踩他的脚，并把他挤到路旁的沟里。他向少爷请安，少爷就夺下他的帽子，抓住他的头发。当锡尔维斯特被欺凌得走投无路时，只好痛哭，以解心头的忧郁。少爷经常咒骂他是私生子。

锡尔维斯特为什么忍受庄园老爷们的欺凌和侮辱呢？使他留恋的，只有庄园里的那位教师。锡尔维斯特从教师那里学到许多知识，特别是关于人类解放的道理。锡尔维斯特来到庄园做仆人的时候已经十六岁了。为了学习知识，每次教师给少爷讲课时，他总是站在少爷身后，听取教师的宣讲，十分留心地听着教师的每一个字眼。锡尔维斯特具有非凡的天才和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只要教师讲过一遍，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学习人类进步知识方面，少爷却显得相形失色了。

知识赋予了锡尔维斯特以无穷的力量，使他透过浓重的云雾，望见了未来的进步世界的闪光。一种谋求自由平等、争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促使主人公锡尔维斯特提出这样的问题：

贵人有什么权利打我？
人有什么权利打人？
上帝创造了人，
不都是平等、相同的吗？
人们称上帝是正义之神，
假如上帝是正义，就应该
对每个人表示相同的慈爱。

锡尔维斯特在获得了知识以后，倾吐了他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的向往，幻想所谓“平等社会”的一片壮丽图景。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著作，获得关于人类解放的先进思想，但是这种思想理论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又无法得到贯彻和实施，从此锡尔维斯特苦恼，忧伤，到处碰壁。

锡尔维斯特逃出庄园，来到农村组织革命力量和宣传革命道理。当他离开庄园时，他与教师难分难舍。教师送他一程又一程，嘱咐他要努力学习，

掌握知识。但是，当锡尔维斯特来到农村以后，他所看到的，同他所幻想的完全两样。他的愉快、希望和理想一天天在消失。大老爷们请他到官衙门供职，他坚决地拒绝了。农民请他到农村作公证人。他不愿发财致富——当一个富翁，坐在账房里收租。他愿意同劳动人民处于平等的地位。正如他自己所说：

我不希望我周围的人
向我一躬到地，
可是别人也别希望我
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膝。

锡尔维斯特站在村公所前面的平台上进行演说，农民们听得入神，他的话“比牧师的优美的词句还要动听”。从此，锡尔维斯特受到爱戴和尊敬。但是，作为封建社会在地方的代理人——老爷和牧师，受到很大威胁，因此千方百计地设法虐杀锡尔维斯特。因为他们懂得：假如锡尔维斯特公证人生存下去，他们就要灭亡。在锡尔维斯特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一位庄园里的少女却出面袒护他。这少女看出了锡尔维斯特作为使徒宣传真理的价值所在。

每天早晨，当锡尔维斯特在村头散步的时候，他都看见那位姑娘从窗口向远处眺望。这位庄园少女具有和锡尔维斯特一样的进步思想，在他们初次相遇时，她就鼓励锡尔维斯特在革命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假如可能，你给予人类以幸福，
你要在苦难中消磨你的生命。
你是大地——你长出谷子，
让别人获得更好的收成！

少女对锡尔维斯特的鼓励，也是期望；这期望代表了劳动人民的共同信念：

你是一盏灯，你给别人送来光明，
你要这样耗尽你的一生！

锡尔维斯特受到十八世纪法国进步思想的启迪和爱情的鼓舞，对于争取“平等社会”的诞生，更加充满信心了。顽固的封建势力教育了他，使他认清了必须走武装革命的道路。他赞扬罗马奴隶主长期统治下的斯巴达克思的反抗精神，并以此来鞭策自己前进：

暴徒？……暴动……暴动……
这是人民长期感受到以后，
干出来的实际的革命行动。
暴徒才是真正的人！
我骄傲地说：我是一个暴徒！
只要我心里感受到的，
我就敢于把它讲出；

我参加千百万人民起义，
整个世界就要天翻地覆，
仿佛斯巴达克斯震动了马罗，
角斗士用挣脱下来的铁链
攻打着城池宫殿！——

锡尔维斯特以大无畏的反抗精神，宣布自己是新时代的“暴徒”，并赞颂“暴力”的无比威力、

锡尔维斯特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他日夜读书和写作。他履行“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诺言，从事革命工作。

庄园里的少女同锡尔维斯特相爱，而且她是那样主动，从农村追赶到首都佩斯的外城，寻求他的足迹，那结果是——

青年把头埋在她的胸前，
他们一起幸福地哭了起来。

上帝和爱情把他们结成夫妻。他们没有互相宣誓忠诚，但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却种下了爱情的种子。锡尔维斯特和少女的心地纯洁得恰似繁星互相照映，从对方的心里吸取光和热。婚后生二子，这给他们带来欢乐，也带来家庭生活的忧虑。锡尔维斯特整天写作，宣传革命的真理。他骄傲地写，自由地写，但是他的作品怎样闯过书报审查这一关呢？这使他烦恼起来。由于在锡尔维斯特的作品中充满了革命、叛乱、暴徒、起义等字眼，他的书就更难出版了。

长诗第十五章是全诗最感人的部分。第十四章的末尾又回到第二章的故事上来，描写锡尔维斯特一家四口人的苦难生活。人口不断增加——“三口，不久又是四口，四口人忍受着痛苦”（第十四章）由于生活困苦，他的小儿子被饿死了。他的妻子坐在小尸体旁边唱着哀歌，希望幼小的灵魂复活。

长诗从第十六章起，叙述锡尔维斯特由于出版进步书籍被捕入狱的悲惨遭遇。在街头上，他被士兵们抓去，推上囚车，押送到监狱里。在押送的途中，他鼓足全身的力量，想从魔掌中逃掉；他像狮子一样勇敢，跟他们厮拼，结果还是被捆绑了起来。士兵们把他推上囚车，他像野兽一样吼叫，并且高声咒骂着国王：

你血腥的手比你的红袍还红，
你苍白的脸比你的银冠还白，
你漆黑的心比你的丧服还黑……

锡尔维斯特预示人民起义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人民起来了，像沸腾的大海在你脚下翻滚！”他在狱中住了十年，受尽了种种折磨。他思念他的亲人们，更思念人类的解放事业和祖国的前途。十年的囚禁生活使他苍老，也使他成熟了。他的体力虽然逐渐虚弱，但他的革命毅力却更加坚强了。诗中锡尔维斯特的大段独白说出了他自己对未来世界的信念和对他妻子和孩儿的眷恋。

第十八章开始，锡尔维斯特听到监狱的墙头上有一只小鸟儿在歌唱。它给他带来了希望与渴望。歌声从沉默中把他唤醒，又给他带来了春天、花朵、

解放事业和忠实的爱情。出狱后，他的家庭全部毁灭，祖国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最后，他走投无路，开枪射杀国王，被捕后押上断头台，结束了他壮丽的、战斗的一生。

从裴多菲的整个的诗歌创作与思想发展来看，这部长诗是诗人一生中创作活动的总结和概括，是诗人“思想的大辞典”。这部长诗融合了诗人三个不同时期的创作特点：第一个时期，一八四六年创作《云》组诗时期的短暂的悲哀，对世界的仇恨；第二个时期，一八四七年对他妻子尤丽亚的忠实的爱情的描写以及诗人预料到他在为民族事业捐躯后的一片惨景；第三个时期，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革命浪潮高涨年代的激进的战斗精神。

从长诗的艺术手法上来看，《使徒》写得很庄重，很有气魄。抒情与叙事的艺术手法得到了巧妙的结合。故事情节富有强烈的戏剧性。结构是严密的、紧凑的，语言是朴素、明朗的，具有散文美。长诗在情调方面，充满着英勇豪迈的战斗精神；有些段落也流露出某些消沉、绝望与阴冷；但它的主题是健康的，这就是锡尔维斯特对旧世界挑战的力量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更可贵的是，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这个憧憬尽管带有空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确实吸引着千百万劳动人民为追求这一理想而流血牺牲。

